



列 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  
叛徒考茨基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中共中央馬克思列寧 恩格斯著作編譯局譯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北京

В. И. ЛЕНИН  
Г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РЕНЕГАТ КАУТСКИЙ

本书是“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6卷，这次  
修订第三版时，译者对译文作了一次修订。

列 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马克思、恩格斯著  
中共中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局编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辑局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9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53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3  $\frac{3}{8}$  字数 77,000  
1954年1月第1版 1954年9月第3版  
1954年9月北京第7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60 元价(1) 0.30 元  
印数 90,001—230,000

## 目 录

序言.....	1
考茨基怎样把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3
資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13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嗎? .....	21
苏維埃不得变成国家組織.....	28
立宪會議和苏維埃共和国.....	34
苏維埃宪法.....	42
什么是国际主义? .....	51
在“經濟分析”的幌子下为資产阶级效劳.....	63
附录一 关于立宪會議的提綱.....	87
附录二 王德威尔得論国家的新书.....	92
注釋.....	99

## 序 言

不久以前在維也納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冊子“无产阶级专政”(Wien.1918.Ignaz Brand,共 63 頁)，是一个最鮮明的例子，說明第二国际正像各国一切正直的社会主义者早就指出的那样，已經遭到最彻底最可耻的破产。現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問題，在許多国家中已实际地摆在日程上了。因此，把考茨基的叛徒的詭辯和完全背弃馬克思主义的行为分析一下是必要的。

但是首先应当着重指出，战争一开始后，本书作者就已多次指出考茨基同馬克思主义決裂了。1914—1916 年間发表在国外“社会民主党人报”<sup>1</sup> 和“共产党人”杂志<sup>2</sup> 上的許多文章，都是闡述这一点的。这些文章曾收集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出版的“反潮流”(著者格·季諾維也夫和尼·列寧，1918 年彼得格勒版，共 550 頁)一书中。关于“考茨基主义”，我在 1915 年日內瓦出版的、隨即譯成德文和法文的小冊子<sup>3</sup> 上，曾这样写道：

“考茨基这位第二国际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一个从口头上承认馬克思主义弄到实际上把馬克思主义变成‘司徒卢威主义’或‘布伦坦諾主义’(就是說，变成承认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由资产阶级学說，这一点表现得特別明显的是俄国作家司徒卢威和德国经济学家布伦坦諾)的最典型最鮮明的例子。我們从普列汉諾夫的例子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們用明显的詭辯阉割馬克思主义的活生生的革命的灵魂，他們承认馬克思主义中的一切，就是不承认革命的斗争手段，不承认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手段并用这

种精神教育群众。考茨基把以下两者无原则地‘调和’起来：一方面是对社会沙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承认在这次战争中保卫祖国，另一方面是对左派作外交式的表面的让步，如在表决军事拨款时弃权，在口头上承认自己采取反对派立场等等。1909年，考茨基写了一整本书来论述革命时代的逼近和战争同革命的联系，1912年考茨基在关于利用即将到来的战争进行革命的巴塞尔宣言上签了字，现在他却千方百计地替社会沙文主义辩护和粉饰，并像普列汉诺夫一样，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譏笑一切革命意图，譏笑一切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步骤。

工人阶级不进行无情的战斗，来反对这种叛徒行径、这种没有气节、向机会主义献媚、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空前庸俗化的行为，便不能实现它的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义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第二国际矛盾的社会产物，是口头上忠实地于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屈服于机会主义的社会产物。”（格·季诺维也夫和尼·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日内瓦版第13—14页）

其次，我在1916年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一书中，详细地分析了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切论断在理论上的虚伪性。我引用了考茨基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我指出这个定义完全不正确，它“适用”于抹杀帝国主义最深刻矛盾，“适用”于同机会主义调和。我提出了我给帝国主义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我指

出了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甚至比不上资产阶级和市侩对它的批评。

最后，我在1917年8、9月间，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1917年11月7日，旧历10月25日）前夜，写了“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一书（1918年初在彼得格勒出版），在该书第六章“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中，我特别谈到了考茨基，证明他完全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把它变成了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认革命，实际上背弃革命”。

其实，考茨基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中所犯的基本理论错误，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作了机会主义的歪曲，这种歪曲我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已作了详细的揭露。

这几点预先说明是必要的，因为从这里可以证明，在布尔什维克夺取国家政权和因此受到考茨基非难以前很久，我就公开指责过考茨基的叛徒行径了。

## 考茨基怎样把马克思变成了 庸俗的自由主义者

考茨基在他那本小册子中讲到的基本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都有极重大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先进国家，尤其是对于各交战国，尤其是在目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必须仔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考茨基是这样提问题的：“两个社会主义派别”（即布尔什维克和非布尔什维克）“的对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的对立，即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对立”（第3页）。

我們要順便說一句，考茨基把俄国的非布尔什維克，即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主义者，是根据他們的名称，即根据他們的言論，而不是根据他們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所占的实际地位。这是何等高明地了解和运用馬克思主又呵！这一点以后再詳細談。

現在應該談主要的东西，就是考茨基关于“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的伟大发现。問題的关键就在这里。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这真是骇人听聞的理論上的混乱，这真是完全背弃馬克思主又，应当說，考茨基远远超过伯恩斯坦了。

无产阶级专政問題是无产阶级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关系問題。看起来这不是朗若白昼嗎？然而考茨基像个一味背誦历史教科书而变得干巴巴的中学教員那样，硬是背朝着二十世紀，面向着十八世紀，在許多章节中千百次枯燥无味地反复咀嚼着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同君主专制、同中世纪制度的关系的滥調！

真是像在梦里嚼树皮！

这根本是文不对題。考茨基竭力想把事情說成似乎有人在鼓吹“鄙視民主”（第 11 頁）等等，这只能引人发笑罢了。考茨基只好用这种无聊的話来抹杀和混淆問題，是因为他按自由主义观点提出問題，只談一般民主，而不談资产阶级民主，甚至避开这个确切的阶级的概念，拚命讲“社会主义以前的”民主。我們的这位廢話专家几乎用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即用了 63 頁中的 20 頁，来大談其空話，这些空話资产阶级是很願意听的，因为这些空話等于是粉飾资产阶级民主，抹杀无产阶级革命的問題。

但是考茨基的书名終究是“无产阶级专政”。馬克思学說的实质正在于此，这是誰都知道的。所以考茨基說了一大堆文不对題

的废话之后，不得不把馬克思談到无产阶级专政的話引用一下。

究竟“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是怎样引用的，这简直是一出滑稽剧！請看：

“这个观点”（即考茨基所說的鄙視民主）“依据的只是卡尔·馬克思說过的一个詞”。——第 20 頁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而在第 60 頁上，这一点甚至又以这样的形式重說了一遍：布尔什維克“湊巧記起了 1875 年馬克思有一次在信中用过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詞儿”（原文上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着：*! des Wörtchens*）。

下面就是馬克思用过的这个“詞儿”：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sup>4</sup>

首先，把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說的这段著名論斷称为“一个詞”，甚至称为一个“詞儿”，这簡直是侮辱馬克思主义，完全背弃馬克思主义。不要忘記，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許多木箱，把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在巴黎公社以前，尤其在巴黎公社以后，无论馬克思还是恩格斯，无论在书信中还是在刊印的著作中，都曾多次談到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不能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公式不过是在历史上更具体、在科学上更确切地說明了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至 1891 年这四十年間，考慮到 1848 年革命尤其是 1871 年革命的經驗时經常談論的。

讀了很多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竟这样駭人听聞地歪曲馬克思主义，这該怎样解释呢？从这一現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

折衷主义和诡辩术来偷换辩证法。考茨基是要这套偷换把戏的大师。从政治实践上来看，这是对机会主义者卑躬屈膝，归根到底就是对资产阶级卑躬屈膝。大战开始以后，考茨基更是突飞猛进，在口头上当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当资产阶级奴才的艺术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再看看考茨基怎样精辟地“解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就会更加相信这一点。请看：

“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了解这个专政的”……（这是叛徒的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恰恰作了许多极详细的指示，不过读了很多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考茨基故意回避这些指示）……“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但是，就本义来讲，这个词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独裁和专制不同，它不是被看作经常的国家制度，而是被看作暂时的极端手段。

‘无产阶级专政’（因而不是个人专政，而是一个阶级专政）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专政决不是指这个词的本义。

他在这里所说的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一切地方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实现过渡，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第 20 页）

我特意把这段议论完全引来，好让读者清楚地看出“理论家”考茨基采用的是什么手法。

考茨基想用先给专政这个“词”下定义的方法来研究问题。好极了。用任何方法研究问题，这是每个人神圣的权利。只是要把研究问题的严肃的老实的态度同不老实的态度区别开来。谁想用这种方法认真研究问题，谁就应当给这个“词”下个定义。这样，问题才会提得清楚而直接。考茨基却不这样。他说：“按本义来讲，专政这个词意味着消灭民主。”

第一、这不是定义。既然考茨基不願意給专政这个概念下定义，他为什么又采取这种方法研究問題呢？

第二、这显然不正确。对自由主义者來說，談一般“民主”是很自然的。馬克思主义者却永远不会忘記問一下：“这是对哪个阶级的民主？”誰都知道，就是“历史学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隶的起义或大騷動，一下子就暴露出古代国家的实质是奴隶主专政。这个专政消灭了奴隶主中間的民主，对奴隶主的民主沒有呢？誰都知道，沒有。

“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說出这种骇人听聞的謬言和謠話，是因为他“忘記了”阶级斗争……

要把考茨基的自由主义的虛假的論斷變成馬克思主义的符合真理的論斷，就必须說：专政不一定意味着消灭对其他阶级实行专政的那个阶级的民主，但一定意味着消灭（或极大地限制，这也是一种消灭方式）被专政的或者說作为专政对象的那个阶级的民主。

但是，不管这个論斷多么符合真理，它并没有給专政下定义。

我們来看看考茨基的下一句話吧：

……“但是，就本文来讲，这个詞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一个人的独裁”……

考茨基像一只瞎了眼的小狗，用鼻子东嗅西嗅，偶然嗅到了一个正确的思想（即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权），但他毕竟沒有給专政下个定义，而且他还說了明明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謠話，說专政意味着个人独裁。这在語法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行专政的可能是一小群人，也可能是寡头，也可能是一个阶级等等。

接着考茨基指出专政同专制的区别，虽然他的說法显然不对，我們也不去分析它了，因为这同我們研究的問題毫无关系。大家知道，考茨基爱从二十世紀轉向十八世紀，又从十八世紀轉向古代，

我們希望德国无产阶级争得专政以后，会考虑到考茨基的这种爱好，让他去当中学的古代史教员。空论专制以避免给无产阶级专政下定义，这不是极端愚蠢的做法，就是非常笨拙的骗子的行为。

总之，我們看到，考茨基立意来談論专政，却讲了一大堆明显的谎话，根本没有下一个定义！他本来可以不依赖他的才智，可以凭記憶从他的“木箱”中拿出馬克思論专政的一切言論。要是这样，他一定能得出下面这个定义或实质上同这一样的定义：

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权。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維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政权。

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觉悟的工人（即群众的代表，而不是像各国社会帝国主义者那样被資本家收买的市侩混蛋的上层分子）都朗若白昼的真理，对于为自身解放而奋斗的被剥削者的每个代表都一目了然的真理，对于每个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爭辯的真理，我們竟要从最博学的考茨基先生那里“通过战争夺回来”！这是什么緣故呢？这是因为成了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卑鄙的献媚者的第二国际領袖們浸透了奴才精神。

考茨基首先玩了一套偷換把戏，公然胡說八道，說什么专政这个词的本义就是个人独裁，接着又（根据这种偷換把戏）說，“可見”，馬克思所讲的阶级专政并不是指这个詞的本义（而是指这样的意思：专政并不意味着革命暴力，而是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的一——請注意这个形容詞——“民主”条件下“和平地”获得多数）。

請看，他說应当把“状态”同“管理形式”区别开来。这种异常深奥的区别，正像我們要把一个不善于推理的人的愚蠢“状态”同他的愚蠢“形式”区别开来一样。

考茨基之所以需要把专政解释为“統治的状态”（他在該书下

一頁即第 21 頁上一字不差地这样說)，是因为这样一来，革命暴力就消失了，暴力革命就消失了。“統治的状态”是在……“民主”条件下任何一种多数所处的状态！通过这样一套騙术，革命就安然无事地消失了！

但这套騙术太笨拙了，因而也挽救不了考茨基。专政的前提和意思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采用叛徒们所不喜欢的革命暴力的“状态”，这是隐瞒不了的，正像“口袋里藏不住雜子”一样。显而易见，所謂“状态”同“管理形式”有区别，这是荒謬可笑的。在这里談什么管理形式更是加倍的愚蠢，因为任何一个小孩都知道君主制与共和制是不同的管理形式。然而我們竟必須向考茨基先生证明，这两种管理形式也同资本主义制度下其他一切过渡的“管理形式”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专政的不同形态而已。

最后，談論管理形式，不仅是愚蠢地而且是粗慥地伪造馬克思的意思，因为馬克思在这里說的分明是國家的形式或类型，而不是管理形式。

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新的国家机器，用恩格斯的話說，“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sup>5</sup>。

所有这一切，考茨基都要加以掩饰和歪曲，因为他的叛徒立場使他非这样做不可。

现在来看看他用了一些怎样可怜的遁詞。

遁詞一。……“馬克思认为英美可能和平变革，即用民主方法实行变革，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在这里指的并不是管理形式”……

这里同管理形式毫无关系，因为有些对资产阶级国家來說不是典型的君主国，并没有军閥制度，而有些在这方面是十分典型的

共和国，却具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这是大家知道的历史事实和政治事实，是考茨基也无法伪造的。

假如考茨基肯认真地老实地談論問題，他就会問一問自己：有没有并无例外情形的关于革命的历史規律呢？他的回答便会是：沒有，沒有这样的規律。这样的規律指的只是典型的东西，即馬克思有一次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当时他所指的是一般的、正常的、典型的資本主义。

其次，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沒有使英美在我們現在探討的这方面成为例外的因素呢？任何一个稍微知道历史問題方面的科学要求的人都很清楚，必須提出这个問題。不提出这个問題，就是伪造科学，就是玩弄詭辯。而提出这个問題，就不会怀疑这样的答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这种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別是因为存在着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关于这一点，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极詳尽地說明过（尤其是在“法兰西內戰”一书及其序言中）。但是，恰恰在馬克思发表这个意見的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恰恰在英美两国，恰恰沒有这种制度！（而现在，这种制度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有了。）

考茨基为了掩盖他的叛徒行徑，只好处处招搖撞騙！

但是，请看他在那里怎样无意地露出了自己的馬腳。他說：“和平地，即用民主方法”！

在給專政下定义的时候，考茨基拚命对讀者隐瞒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即革命暴力。可是現在真相大白了：問題正在于和平变革同暴力变革的对立。

問題的实质就在这里。考茨基需要运用一切遁詞、詭辯和騙人的伪造，正是为的避开暴力革命，为的掩盖他背弃这种革命的行为，掩盖他轉到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即轉到资产阶级方面的行

为。問題的实质就在这里。

“历史学家”考茨基无耻地伪造历史，竟“忘記了”一件基本事实：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它的全盛时期也正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它的根本的經濟属性（这种属性在英美表現得特別典型），其特征是比較說來最愛和平，最愛自由。但是帝国主义，即在二十世纪才完全成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它的根本的經濟属性，其特征则是最不爱和平，最不爱自由，最大限度地到处发展軍閥制度。在談論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問題具有多大的典型性或可能性时，竟然“不注意到”这一点，那就等于墮落為資产阶级最庸俗的奴僕了。

遁詞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它是由不剥夺資产阶级选举权的全民投票，即用“民主方法”选举出来的。于是考茨基洋洋得意地說：……“在馬克思看來”（或者照馬克思的意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情况下 (bei überwiegendem Proletariat, S.21)，从純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

考茨基的这个論据，异常荒唐可笑，真使人感到有 *embarras des richesses*（駁不胜駁的困难）。第一、大家知道，資产阶级的精华、大本營和上层分子都从巴黎逃到凡尔賽去了。在凡尔賽还有“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这又表明考茨基硬說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別”都参加了公社是造謠。当时巴黎居民分成两个交战的營壘，其中一个營壘集中了全部战斗的、政治上积极的資产阶级，把这种情形說成是“全民投票”的“純粹民主”，不是太可笑了嗎？

第二、公社反对凡尔賽的斗争就是法国工人政府反对資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既然法国的命运决定于巴黎，怎能談得上“純粹民主”和“全民投票”呢？当馬克思认为公社沒有夺取属于全法国的銀行是一个錯誤的时候<sup>6</sup>，难道他是从“純粹民主”的原則和实践出

发的嗎??

幸而考茨基是在警察禁止人們“聚众”发笑的国家里写书，不然考茨基真是會被人笑死的。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向背得出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提示一下恩格斯从……“純粹民主”的观点对公社所作的估計：

“这些先生”（反权威主义者）“見过革命沒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过來說，难道我們沒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嗎？”<sup>7</sup>

請看，这就是“純粹民主”！一个异想天开、竟在划分为阶级的社会中一般地談論“純粹民主”的卑鄙市侩、“社会民主党人”（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在法国以及 1914—1918 年在全欧洲所說的“社会民主党人”），該会受到恩格斯怎样的嘲笑！

够了，要把考茨基的謬論一一列举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每句話里都充满了十足的叛徒精神。

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詳尽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它的功績在于作了打碎和摧毁“現成的国家机器”的嘗試。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結論非常重要，因此，他們在 1872 年对“共产党宣言”<sup>8</sup>部分“陈旧了的”綱領仅仅作了这个修改。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公社曾經消灭军队和官吏制度，消灭議会制，破坏“寄生贅瘤——國家”等等；而絕頂聰明的考茨基却傻头傻脑地重复自由主义教授們說过千百次的东西，即关于“純粹民主”的童話。

难怪罗莎·卢森堡在 1914 年 8 月 4 日說，德国社会民主党現在已是一具臭尸了！

遁詞三。“如果我們說专政是管理形式，我們就不能說階級专政，因为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階級只能統治而不能管理”…… 能管理的是“組織”或“政党”。

“糊塗顧問”先生，你糊塗了，你糊塗透了！专政不是“管理形式”，說专政是管理形式，這是可笑的胡說。馬克思講的并不是“管理形式”而是國家的形式或类型。这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說階級不能管理，也是完全不对的；这种廢話，只有除了资产阶级議会什么也看不見、除了“执政党”什么也不注意的“議会迷”才說得出来。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会让考茨基看到統治階級管理國家的例子，例如中世紀的地主便是这样，虽然他們的組織程度还不够。

总之，考茨基史无前例地歪曲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把馬克思变成了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說，考茨基本人已經墮落到自由主义者的地步，因为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卑鄙地空談“純粹民主”，粉飾和抹杀资产阶级民主的阶级內容，最害怕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暴力。既然考茨基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一概念作了这样的“解释”，使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的革命暴力消失了，他也就是在对馬克思作自由主义的歪曲方面打破了世界紀錄。叛徒仙恩施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較起来，簡直是个后生小輩了。

## 資產階級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考茨基弄得一塌糊塗的問題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

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附帶說一下，“純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階級鬥爭也不了解國家实质的无知的論調，而且是十足的空談，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純粹的”民主）。

“純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謊話。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頁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談。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經地談論魏特林，談論巴拉圭的耶穌会教徒，談論許許多别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謊話来蒙蔽工人，以便迴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弃、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騙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說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問題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

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獻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

我們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被我們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記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見解，然后再來作一个最通俗的說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現代的代議制的国家”也“是資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見恩格斯論国家的著作）<sup>9</sup>。“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必須用來对敌人实行暴力鎮压的一种暫时的机关，那末，說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純粹是无稽之談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鎮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复存在了。”（恩格斯1875年3月28日給倍倍尔的信）“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鎮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見恩格斯为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序言）<sup>10</sup> 普选制是“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志。在现代国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論国家的著作）<sup>11</sup>。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咀嚼这个論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加了着重号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閉口不談！。“公社不应当是議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議会里代表和压迫（ver-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们服务，使他們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計，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人生一样。”（馬克思論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sup>12</sup>

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論点，其中每一个論

点都在打他的嘴巴，揭发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徑。在考茨基的整本小册子中，連了解这些眞理的影子都沒有。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內容都是对馬克思主義的嘲弄！

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处处可以看見每个誠实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資产阶级民主的虛伪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許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資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試圖不像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調动军队来鎮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飾資产阶级民主，閉口不談美国或瑞士最民主的、最帶共和色彩的資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呵，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閉口不談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无耻。他宁願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話。这很难令人相信，但这是事实！在公元 1918 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屠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像列諾得尔和龙格之流，不像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像韓德逊和韦伯之流那样无耻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們）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頌揚起“保护少数”来了。誰要是願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 15 頁。而在第 16 頁上，这位博学的……人物甚至把十八世紀英國的輝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讲給你听呢！

多么淵博呵！向資产阶级獻媚是多么无微不至呵！呵，在資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舐他們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呵！假如我是克虏伯或謝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諾得尔，我一定会用百万金酬謝考茨基，用犹大的接吻奖賞他，在工人面前称赞他，动人

們同考茨基这样“可敬的”人物保持“社会主义的統一”。著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讲述十八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故事，硬說民主就是“保护少数”，絕口不談“民主”共和国美国对国际主义者的残害，难道这不是奴顏婢膝地为资产阶级效劳吗？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記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統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問題上，不仅不“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横加殘害。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残害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規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的英国的爱尔兰和烏尔斯脱事件<sup>13</sup>中，在1917年4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以及策划对布尔什维克的殘害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仅举出战时的例子，而且举出战前和平时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宁願閉眼不看二十世纪的这些事实，而向工人讲述十八世纪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十分新鲜、极共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资产阶级議会來說吧。能不能設想博学的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愈发达，交易所和銀行家对资产阶级議会的操纵就愈厉害呢？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不應該利用资产阶级議会（布尔什維克利用議会，恐怕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1912—1914年，我們把第四届杜馬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爭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結論說，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像考茨基那样忘記资产阶级議会制的历史局限性和条件性。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

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准备群众进行革命，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绝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像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本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侵略战争和签订“分割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分割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结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没有看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没有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

決不了極其重大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是交易所和銀行）的門徑被千百道墻垣阻隔著，所以工人們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覺到，看到和感受到：資產階級的議會是別人的機構，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者的工具，是敵對階級即剝削者少數的機構。

蘇維埃是被剝削勞動群眾自己的直接的組織，它便於這些群眾自己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建設國家和管理國家。這裡，恰恰是被剝削勞動者的先鋒隊——城市無產階級具有一種優越條件，就是大企業把他們極好地聯合起來了；他們最容易進行選舉和監督當選人。蘇維埃組織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剝削勞動者便於團結在他們的先鋒隊即無產階級的周圍。舊的資產階級機構，即官吏，財富特權，資產階級教育和聯繫等等特權（資產階級民主愈發達，這些事實上的特權也就愈多種多樣）——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為印刷所和紙張都從資產階級手裏奪過來了。最好的建築、賓館、公館、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蘇維埃政權把千萬座好房子一下子從剝削者手裏奪過來，就使群眾的集會權利更加“民主”<sup>百萬倍</sup>，而沒有集會權利，民主就是騙局。非地方蘇維埃的間接選舉使蘇維埃代表大會易于舉行，使整個機構开支小些，靈活些，在生活緊張而又要求特別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地方代表的時期，使工農更便於參加。

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sup>百萬倍</sup>，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要民主<sup>百萬倍</sup>。

只有自觉的資產階級奴僕，或是政治上已經死亡、受益滿灰尘的資產階級書籍蒙蔽而看不見實際生活、浸透資產階級民主偏見、因而在客觀上變成資產階級奴才的人，才會看不到這一點。

只有不能站在被壓迫階級的立場上提出如下問題的人，才會看不到這一點。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一般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像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大厦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会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哪怕是找到一个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的人，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而不是对富人的民主，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感触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了解每个工人都了解的这一明显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或“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他正像夏洛克<sup>14</sup>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

一律平等，不然就沒有民主。

我們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嗎？

在討論第二國際思想領袖的著作時竟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問題，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議。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談起了考茨基，就必須向這位博學的人說明，為什麼剝削者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

## 被剝削者同剝削者能平等嗎？

考茨基是這樣推論的：

(1) “剝削者總是只占人口的極少數。”(考茨基的小冊子第14頁)

這是無可爭辯的真理。從這一真理出發，應該怎樣推論呢？可以按馬克思主義觀點，按社會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以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关系為基礎。也可以按自由主義觀點，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以多數和少數的關係為基礎。

如果按馬克思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必須說：剝削者必然要把國家（這裡說的是民主，即國家的一種形式）變成本階級即剝削者統治被剝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剝削者還統治着被剝削者多數，民主國家就必然是對剝削者的民主。被剝削者的國家應該根本不不同于這種國家，它應該是對被剝削者的民主，是對剝削者的鎮壓。而鎮壓一個階級，就是對這個階級不講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義觀點來推論，那就必須說：多數決定，少數服從。不服從者受處罰。再沒有別的了。至于一般國家，包括“純粹

民主”在內，具有怎样的階級性，就根本用不着講了；這同問題沒有關係，因為多數就是多數，少數就是少數。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

考茨基正是這樣推論的：

(2)“根據什麼理由無產階級的統治要採取而且必須採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 21 頁)接着他就說明無產階級擁有多數，而且說得極其詳細，極其囉嗦，既引用了馬克思的話，又舉出了巴黎公社選票的數字。結論是“一個這樣牢固地扎根在群眾中的制度是沒有絲毫理由去損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來壓制民主的情況下，這個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來回答。但是，一個知道自己受到群眾擁護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護民主，而不是為了滅絕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本，要去掉道義上的強大權威的深刻泉源——普選制，那它就簡直是自杀了。”(第 22 頁)

你們看，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論據中消失了。剩下來的只是一般多數，一般少數，一般民主，我們已熟悉的“純粹民主”。

請注意，這些話還是談到巴黎公社時說的呢！現在我們不妨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看看他們談到巴黎公社時關於專政是怎樣說的：

馬克思說：……“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工人……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賦予國家以一種革命的暫時的形式”……<sup>15</sup>

恩格斯說：……(在革命中)“獲得勝利的政黨迫於必要，不得不憑借它的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一

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嗎？”……<sup>16</sup>

恩格斯又說：“既然國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必須用來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的一種暫時的機關，那末，說自由的人民國家，就純粹是無稽之談了：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它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sup>17</sup>

考茨基和馬克思、恩格斯，正如自由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者一樣，實有天淵之別。純粹民主和考茨基籠統地說的“民主”不過是“自由的人民國家”的另一說法，也就純粹是無稽之談。考茨基帶着飽學的書呆子的博學神情和十歲女孩的天真態度問道：既然擁有多數，還要專政干什么呢？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說：

——為了粉碎資產階級的反抗。

——為了使反動派恐懼。

——為了維持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权威。

——為了使無產階級能夠對敵人實行暴力鎮壓。

這些解釋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戀於民主的“純粹性”，看不見它的資產階級性，“始終如一地”主張多數既然是多數，就用不着“粉碎”少數的“反抗”，用不着對少數“實行暴力鎮壓”，只要對破壞民主的情況實行鎮壓就够了。考茨基迷戀於民主的“純粹性”，無意中犯了一切資產階級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錯誤：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完全是騙人的和虛偽的）當做事實上的平等！小事情！

剝削者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

這個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歡，但它却是社會主義的最重要的內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

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見极特殊的場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世代代又受教育，又过富裕生活，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述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惶恐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重要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丰富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忘記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严重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向群

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像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而这种希望就会变为复辟的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到处诉苦，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像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拼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的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呵！

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像奥吉亚斯的牛圈<sup>①</sup>那样堆满了庸

<sup>①</sup> 希腊神话中说，奥吉亚斯的牛圈三十年来没有打扫，后来被海格立斯在一日内扫清。意思是说破肮脏、极污臭的地方。——译者注

俗、近視和叛變的移物……

\* \* \*

讀者大概已經注意到，考茨基在我們上面引來的一段話內，說到什么侵害普選制（附帶指出：考茨基把普選制稱為道義上的強大權威的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論述巴黎公社和也是論述專政問題的時候，却說的是對付資產階級的武裝人民這個權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對“权威”的看法比較一下，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必須指出，剝奪剝削者的選舉權問題，是純粹俄國的問題，而不是一般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如果考茨基不虛偽，把他的小冊子叫做“反對布爾什維克”，那末，小冊子的名稱就符合它的內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權直接談論選舉權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論家”的姿態出現。他給自己的小冊子加了這樣的標題：一般“無產階級專政”。他只是在小冊子的後一部分，從第六節起，才專門談到蘇維埃和俄國。前一部分（我引證的話就在這一部分）談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專政。考茨基一談到選舉權，便顯了原形，表明他是一個根本不顧理論的、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論戰家。因為理論，即關於民主和專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個民族特殊的）階級基礎的論斷，不應該談選舉權這樣的專門問題，而應該談一般問題：在推翻剝削者、用被剝削者的國家代替剝削者的國家的歷史時期，能不能既保留對富人的民主、也保留對剝削者的民主呢？

理論家就是這樣而且只能是這樣提出問題。

我們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巴黎公社以及談到巴黎公社時的一切論斷。我根據這種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寫的“國家與革命”那本小冊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專政的問題。我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限制選舉權的問題。現在應該說，限制選舉權的問題是專政在某一個民族中的特殊問題，而不是專

政的一般問題。談到限制选举权的問題，應該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及其发展的特殊道路。这一点我将在以后說明。預先就扭保說，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全部或大部分一定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錯誤的。这种限制也許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經驗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邏輯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純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論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問題。考茨基沒有这样提出問題，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論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全部或大部）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問題。这不是理論問題，理論問題在于：不破坏对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談这个在理論上唯一重要的本质問題。考茨基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各样的話，就是沒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問題有关的話。

考茨基什么都談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出他們的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談了，就是沒有談主要的东西，沒有談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沒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沒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 \* \*

現在我們來談談俄國革命的經驗，談談導致解散立憲會議和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和立憲會議之間的分歧。

## 蘇維埃不得變成國家組織

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國形式。一個著書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果真正研究過這個現象（而不是像重彈孟什維克老調的考茨基那樣重複小資產階級對專政的哀怨），就會先給專政下個一般定義，然后再研究它的特殊的、民族的形式——蘇維埃，並把蘇維埃當作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之一加以批判。

既然考茨基對馬克思的專政學說作了一番自由主義的“加工”，當然不能期望他會說出什麼有重大意義的東西。但是，看看考茨基怎樣研究什麼是蘇維埃的問題以及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倒是十分有意義的。

他在回憶 1905 年蘇維埃的產生時寫道：蘇維埃創造了“無產階級的所有組織形式中最能包羅一切的(umfassendste)組織形式，因為它包括了全體雇工人”（第 31 頁）。1905 年蘇維埃還只是地方團體，而在 1917 年却成了全俄國的聯合組織。

考茨基繼續說：“蘇維埃組織現在已經有了偉大的光榮的歷史。它的未來歷史還會更加偉大，而且不限於俄國一國。到處可以看到，要反對金融資本在經濟上政治上的雄厚勢力，無產階級進行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已經不夠了。”（原文為 *versagen*；這個德文詞的意思介於“不夠”和“無力”之間，比前者稍強，比後者稍弱）“這些舊方法不能放棄，它們在平常時期仍然是必需的，但是有時會產生一些任務，用這種方法不能解決，而只有把工人階

級的一切政治和經濟的實力手段集中起來，才能順利解決。”（第 32 頁）

接着他談到群眾罷工，談到“工會官僚”同工會一樣是必要的，但它“不適于領導那些日益成為時代標誌的強大的群眾鬥爭”……

考茨基得出結論說：……“這樣看來，蘇維埃組織是當代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它在我們正去迎接的資本同勞動的大決戰中將起決定的作用。

但是，我們能不能向蘇維埃要求更多的東西呢？1917 年 11 月（指新曆，按我國舊曆為 10 月）革命後，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一道在俄國工人代表蘇維埃中占多數的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解散後，竟把向來是一個階級的鬥爭組織的蘇維埃變成了國家組織。他們消滅了俄國人民在 3 月（指新曆，按我國舊曆為 2 月）革命中爭取到的民主。與此相適應，布爾什維克不再把自己稱為社會民主黨人。他們把自己稱為共產黨人了。”（第 33 頁，着重號是考茨基加的）

凡是看過俄國孟什維克著作的人，立刻會看出考茨基是在怎樣盲目照抄馬爾托夫、阿克雪里羅得和史騰之流的言論。正是“盲日”照抄，因為考茨基為了迎合孟什維克的偏見，竟把事實歪曲到了可笑的地步。例如，考茨基竟未顧到向他的情報員，如柏林的史騰或斯德哥爾摩的阿克雪里羅得打聽一下，布爾什維克改名為共產黨人和蘇維埃作為國家組織的意義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提出的。如果考茨基做了這樣簡單的查問，他就不會寫出這段令人發笑的話來，因為這兩個問題是布爾什維克在 1917 年 4 月提出的，例如我的 1917 年 4 月 4 日的“提綱”就提出過，就是說，是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更不必說 1918 年 1 月 5 日解散立憲會議了）提出的。

但我全部引來的考茨基的這段議論，就是整個蘇維埃問題的關鍵。關鍵就在於蘇維埃是應該力求成為國家組織（布爾什維克在 1917 年 4 月已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同年同月在布

爾什維克党代表會議上又声明他們不以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国為滿足，他們要求巴黎公社类型的或蘇維埃类型的工农共和国），或者不應該力求这样做，不應該夺取政权，不應該成为国家組織，而應該照旧是一个“階級”的“战斗組織”（馬尔托夫就是这样說的，他是用天真的願望来粉飾这样一件事实，在孟什維克領導下蘇維埃是使工人服从資產階級的工具）。

考茨基盲目重复馬尔托夫的話，抓住布尔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理論爭論中的片斷，毫无批判、毫无意义地将这些片断搬到一般理論問題、一般歐洲問題上去。結果弄得一团糟，使俄国每个觉悟的工人看到考茨基的上述議論都要捧腹大笑。

一旦我們向歐洲所有的工人說明事實真相，考茨基也一定会遭到他們（除了极少数頑固不化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同样的嘲笑。

考茨基像熊那样給馬尔托夫帮了倒忙<sup>①</sup>，十分明显地把馬尔托夫的錯誤弄到了荒謬絕伦的地步。請看考茨基究竟說了些什麼。

蘇維埃包括全体雇佣工人。要反对金融資本，无产阶级的經濟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旧方法已經不够了。蘇維埃不仅在俄国将起伟大的作用，在欧洲資本同劳动的大决战中也将起决定的作用。考茨基就是这样說的。

好极了。“資本同劳动的决战”是不是要解决这两个階級中哪一個階級掌握国家政权的問題呢？

决不是。根本不是。

在“決”战中，包括全体雇佣工人的蘇維埃不應該成为国家

---

① 这个典故出自“克雷洛夫寓言”。他在“隱士和熊”一文中描寫一个隱士和熊作朋友。一天，隱士和熊出游，途中隱士因倦酣睡，熊为了赶走一只歇在它友入鼻子上的蒼蠅，用一块大石头把友人的脑袋砸成两半。——譯者注

組織！

国家是什么呢？

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总之，被压迫阶级，现代社会中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应该努力去进行“资本同劳动的决战”，但不应该触犯资本用来镇压劳动的机器！不应该摧毁这个机器！不应该用自己的包罗一切的组织来镇压剥削者！

考茨基先生，好极了，妙极了！“我們”承认阶级斗争，——就像一切自由派承认它那样，就是說不要推翻资产阶级……

正是在这里，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已经很明显了。这实际上是转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资产阶级什么都会允许，就是不允许受它压迫的阶级的组织变成国家组织。在这里，考茨基已经完全无法挽救他那朝和一切、用空话搪塞各种深刻矛盾的立场了。

考茨基或者是根本反对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或者是容许工人阶级把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拿到手中，但决不容许他们摧毁、打碎这个机器，并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论怎样“解释”和“说明”考茨基的论断，在两种情况下，考茨基同马克思主义决裂和转到资产阶级方面的事实都是十分明显的。

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胜利的工人阶级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时就说过：“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sup>18</sup>。现在，一个妄想继续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出来，已经全部组织起来并同资本进行“决定性斗争”的无产阶级，不应该把自己的阶级组织变成国家组织。恩格斯在1891年所说的“在德国已经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的“对国家的迷信”<sup>19</sup>，就是考茨基在这里所暴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这位庸人“同意”说：工

人們，鬥爭吧（這是資產者也“同意”的，既然工人反正都要鬥爭，那就只好設法挫折他們的劍鋒了），——鬥爭吧，但是不得勝利！不要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要用無產階級的“國家組織”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組織”！

誰真正同意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這一馬克思主義觀點，誰多少考慮過這個真理，誰就決不會說出這種荒謬絕倫的話來，說什麼能够战胜金融資本的無產階級組織不应当變成國家組織。正是在這一點上顯出了小資產者的原形，在小資產者看來，國家“終究”是一種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東西。究竟為什麼可以允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去同那不僅統治著無產階級而且統治著全體人民、全體小資產階級、全體農民的資本實行決戰，却不允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把自己的組織變成國家組織呢？因為小資產者害怕階級鬥爭，不能把它進行到底，進行到取得最主要的东西。

考茨基完全糊塗了，他充分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你們看，他親口承認，歐洲正去迎接資本同勞動的決戰，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舊方法已經不夠了。而這些方法恰恰就是利用資產階級民主。因此？……

考茨基不敢進一步去想由此應該得出什麼結論。

……因此，只有反動派，只有工人階級的敵人，只有資產階級的走狗，才會在現時描繪資產階級民主的妙處，空談純粹民主，把臉朝着陳旧的過去。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起來，曾經是進步的，當時是應該利用的。但是現在，對工人階級來說，它已經不夠了。現在不應該向後看，而應該向前看，應該拿無產階級民主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在資產階級民主國家範圍內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工作，即訓練和組織無產階級大軍，是可能的（也是必要

的)，但是到了應該进行“决战”的时候，还把无产阶级限制在这种范围内，那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事业，成了叛徒。

考茨基陷入了特別可笑的窘境，因为他重复馬尔托夫的論据，却沒有觉察到馬尔托夫的这个論据是以考茨基所沒有的另一个論据为依据的！馬尔托夫說（而考茨基則跟着他重复說），俄国还没有成熟到社会主义，由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結論：把苏維埃从斗争机关变为国家組織，为时尚早（应讀作：在孟什維克領袖們帮助下，把苏維埃变成使工人服从帝国主义資产阶级的机关，倒是适时的）。而考茨基却不能公开說，欧洲還沒有成熟到社会主义。考茨基在1909年還沒有成为叛徒的时候写道：現在不能害怕过早的革命，誰害怕失败而拒絕革命，誰就是叛徒。考茨基不敢直接否认这一点。結果得出了一个把小資产者的愚蠢和怯懦彻底暴露出来的謬論：一方面，欧洲已成熟到社会主义，正在走向資本同劳动的决战；而另一方面，战斗組織（即在斗争中形成、发展和巩固起来的組織），被压迫者的先鋒队、組織者和領袖无产阶级的組織，却不能变成國家組織！

\* \* \*

苏維埃作为战斗組織是必要的、但不應該变成国家組織这一思想，在政治实践方面比在理論方面还要荒謬得多。甚至在沒有革命形势的和平时期，工人反对資本家的群众斗争，如群众罢工，也要引起双方极大的愤恨，激起不尋常的斗争热情，也会使資产阶级經常搬出他們的老一套，說什么我还是“一家之主”，而且还要当下去，等等。而在政治生活沸腾起来的革命时期，像苏維埃这种包括一切工业部門的全体工人以至全体士兵、全体劳动的貧苦的农村居民的組織，由于斗争的进程，由于简单的攻守“邏輯”，必然要直截了当地提出問題。想站在中間立場，“調和”无产阶级和資产

階級，是愚蠢的，一定要遭到可耻的破产。在俄国，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維克的說教已經遭到破产，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如果苏維埃稍微广泛地发展起来，能够联合并巩固起来，这样的說教也必然会被遭到同样的破产。对苏維埃說，斗争吧，但不要亲自掌握全部国家政权，不要变成国家組織，这就是宣揚无产阶级同資产阶级的阶级合作和“社会和平”。要是以为在剧烈的斗争中，这种立場除了可耻的破产以外，还会有什么别的結果，那就很可笑了。脚踏两只船是考茨基一生的命运。他裝做在理論上完全不同意机会主义者的樣子，其实他在实践上，在一切重大問題（即一切同革命有关的問題）方面都是同意机会主义者的。

## 立宪會議和苏維埃共和国

关于立宪會議和布尔什維克解散立宪會議的問題，是考茨基整本小册子的中心問題。他經常回到这个問題上来。第二国际思想領袖的这部著作滿篇都是指责布尔什維克“消灭了民主”（见上面引的考茨基的一段話）。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要問題，因为在这里，資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相互关系已經实际地摆在革命面前了。現在来看看我們这位“馬克思主义理論家”是怎样考察这个問題的。

他引用了我所写的发表在1917年12月26日“真理报”上的“关于立宪會議的提綱”。这似乎是考茨基拿着真凭实据来认真討論問題的最好证明了。但是，请看考茨基是怎样引证的。他沒有說这个提綱有19条，沒有說这个提綱既提出了有立宪會議的普通資产阶级共和国和苏維埃共和国之間的相互关系問題，也提出了立宪會議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革命中分歧的历史問題。所有这

些，考茨基都避开不談，他只簡單地對讀者說，“其中（在這個提綱中）有兩條特別重要”：一、社會革命黨發生分裂是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後，但在立憲會議召集以前（考茨基不說出這是提綱第五條）；二、一般說來，蘇維埃共和國是比立憲會議更高的民主形式（考茨基不說出這是提綱第三條）。

考茨基只完整地引用了這個提綱第三條的一部分，即如下的論點：

“蘇維埃共和國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有立憲會議这一花冠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sup>①</sup>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考茨基省去了“普通”一詞和这一条开头的一句話：“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

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考茨基就用妙不可言的諷刺口吻惊叹道：

“可惜，他們只是在立憲會議占了少数之后才作出这个結論。从前誰也沒有像列寧那样激烈地要求召集立憲會議。”

在考茨基的书第 31 頁上就是这样一字不差地写着的！

这真是妙論！只有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才能这样伪造事实，使讀者得到一种印象，好像布尔什維克关于更高类型的国家的一切議論，都是布尔什維克在立憲會議占少数之后凭空想出来的！只有卖身給资产阶级或者（这完全是一样的）信賴了巴·阿克雪里罗得而又把自己的情报員隐瞒不說的混蛋，才能說出这种卑

---

① 别帶說一下，考茨基多次引用了“最无痛苦地”过渡这几个字，大概他想借此来讽刺一下。可是他用的方法不中用，所以在几頁之后，他就作假，把引文仍造成“无痛苦地”过渡！当然，用这种方法把荒謬的話加到論敵身上是不困难的。作假也能帮助从实质上回避論据：只有把全体貧农組織起来（成为苏維埃），只有国家政权的中坚（无产阶级）帮助这种組織，才有可能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鄙的謠話。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回到俄国的第一天——1917年4月4日，就当众宣读了我的提綱，指出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优于资产阶级議会制共和国。后来我又屢次在出版物中，例如在論各政党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譯成英文<sup>20</sup>，1918年1月刊載于美国紐約《Evening Post》<sup>21</sup>）中，談到这一点。不仅如此，1917年4月底举行的布尔什維克党代表會議还通过了一項決議，指出无产阶级一农民共和国高于资产阶级議会制共和国，我党不能以后者为滿足，党綱應該作相应的修改。

既然如此，那末考茨基硬要德国讀者相信：我曾激烈要求召集立宪會議，只是布尔什維克在立宪會議占了少数之后，我才“貶低”立宪會議的榮譽和声望，考茨基的这种异乎寻常的行为該叫做什么呢？有什么理由可以原諒这种行为呢？<sup>①</sup>难道考茨基不知道事實嗎？要真是这样，他为什么又要写书談这些事實呢？他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地說：我，考茨基，是根据孟什維克史騰和巴·阿克雪里罗得这班人的情報写的呢？考茨基是想用自以为客观的态度来掩盖他給那些因失敗而不滿的孟什維克充当奴僕的事实。

但这只是花朵。果实还在后面哩。

我們就假定說，考茨基当时不願意或不可能（??）从他的情报員那里得到布尔什維克在是否以资产阶级議会制民主共和国为滿足这个問題上的決議和声明的譯文。我們就假定是这样，虽然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要知道，考茨基在他的书第30頁上是直接提到我的1917年12月26日的提綱的。

考茨基是知道这个提綱的全部，还是只知道史騰、阿克雪里罗

<sup>①</sup> 附带說一下：在考茨基的小册子中，这种孟什維克式的說話是很多的！这是心怀憎恨的孟什維克的非謬性的小册子。

得等人給他譯出的那一部分呢？關於布尔什維克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前是否意識到、是否向人民說過蘇維埃共和國高於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根本問題，考茨基引用了第三條。但是考茨基絕口不談第二條。

第二條是：

“革命社會民主黨提出了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從 1917 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蘇維埃共和國是比有立憲會議的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高的民主制形式。”（着重號是我加的）

為了把布尔什維克說成沒有原則的人，說成“革命的機會主義者”（考茨基在書上一個地方用過這個說法，但不記得他是在講什麼問題時說的），考茨基先生把提綱直接提到“多次”聲明這一點向德國讀者隱瞞起來了！

这就是考茨基先生所使用的渺小的、可怜的、卑鄙的手法。他就是这样避开了理論問題。

說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制共和國低於巴黎公社類型的或蘇維埃類型的共和國，這對不對呢？這就是問題的中心，而考茨基却避而不談。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時所說的一切都被考茨基“忘記了”。他还“忘記了”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28 日寫給倍倍爾的信，這封信特別明白易懂地表达了馬克思的相同的思想：“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

請看，這就是第二國際最卓越的理論家，他寫了專門論述“無產階級專政”的書，專門談到了曾經直接地多次地提出比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高的國家形式問題的俄國，却閉口不談這個問題。這實際上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有什么區別呢？

（我們附帶說一下：在這裡，考茨基也是跟着俄國孟什維克跑的。在孟什維克中間，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種引文”的人，多

得不可胜数，然而从 1917 年 4 月至 1917 年 10 月，再从 1917 年 10 月至 1918 年 10 月，竟没有一个孟什维克作过一次尝试去研究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问题。普列汉诺夫也回避了这个问题。大概是只好默不作声吧。）

很明显，同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在主要问题即巴黎公社类型国家问题上却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人，谈论解散立宪会议，简直是对牛弹琴。只要在本书附录中把我的关于立宪会议问题提纲全文刊印出来就够了。从这个提纲中，读者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 1917 年 12 月 26 日就已从理论上、历史上和政治实践上提出来了。

既然考茨基作为理论家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那他也许会作为历史学家来考察苏维埃同立宪会议斗争的问题。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能够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考茨基即使作为历史学家也离开了真理，忽视了人所共知的事实，成了一个逢迎献媚的奴才。他想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没有原则的人，说布尔什维克在解散立宪会议以前曾怎样试图缓和他们同立宪会议的冲突。这里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没有什么要否认的；现在我把提纲全文刊印出来，提纲上明显不过地写着：跋扈在立宪会议中的动摇的小资产者先生们，或者是你们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解，或者是我们的“用革命手段”战胜你们（提纲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

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对待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向来是这样，而且永远是这样。

考茨基是从形式上看立宪会议问题的。在我的提纲内屡次明白地说过，革命的利益高于立宪会议形式上的权利（见提纲第十六

条和第十七条)。形式主义的民主观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考茨基也许不能不承认，资产阶级议会是某一个阶级的机关。但是现在考茨基需要（为了进行背弃革命的卑鄙勾当）忘记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不提出俄国立宪会议是哪个阶级的机关的问题。考茨基不分析具体环境，不愿看看事实，根本不向德国读者说，我的提纲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问题（提纲第一条至第三条），不仅谈到了使1917年10月中旬各党派提出的名单同1917年12月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具体条件（提纲第四条至第六条），而且谈到了1917年10月至12月阶级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历史（提纲第七条至第十五条）。我们根据这段具体历史得出了结论（提纲第十四条）：“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的口号，实际上成了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派及其帮凶的口号。

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历史学家考茨基从来没有听说过，普选制有时产生小资产阶级的议会，有时产生反动的反革命的议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考茨基没有听说过，选举形式、民主形式是一回事，这个机构的阶级内容却是另一回事。立宪会议的阶级内容问题，在我的提纲中已经直接提出和解决了。也许我解决得不对。假使有人对我们的分析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那我们真是求之不得。考茨基本来不应该写些十足的蠢话（这种话在考茨基的著作中很多），说有人在阻碍批评布尔什维主义，而应该进行这种批评。可是问题正在于考茨基没有进行这种批评。他甚至没有提出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进行阶级分析的问题，因此，无法同考茨基展开争辩或辩论，只好向读者表明：为什么只能把考茨基称为叛徒。

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分歧有它的历史，这个历史，甚至是不用阶级斗争观点观察问题的历史学家也不能回避的。考茨基连这个实际历史也不愿涉及。他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现在只有心怀恶意的孟什维克才隐瞒这个事实）：苏维埃即使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即在1917年2月底至10月，也是同“全国的”机构（即资产阶级的机构）有分歧的。实际上，考茨基所持的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妥协、合作的观点；不管考茨基怎样否认，但他的这种观点终究是一个事实，这已经为他的整本小册子所证实了。说不应该解散立宪会议，这就是说，不应该把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不应该推翻资产阶级，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同资产阶级调和起来。

为什么考茨基闭口不谈孟什维克在1917年2月至10月干过这种不体面的勾当并且毫无成就呢？如果能够使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调和起来，为什么在孟什维克占统治地位时，这种调和竟未成功，资产阶级置身苏维埃之外，苏维埃被称为（被孟什维克称为）“革命民主”，而资产阶级被称为“有资格的分子”呢？

考茨基对德国读者隐瞒了一件事实：正是孟什维克在自己的统治“时代”（1917年2—10月）称苏维埃为革命民主，从而承认苏维埃优于其他一切机构。正由于隐瞒了这件事，历史学家考茨基把事情说成似乎苏维埃和资产阶级的分歧没有它的历史，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恶劣行为无缘无故地一下子突然发生的。其实，正是孟什维克实行妥协政策、企图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调和的半年多的（对于革命，这是很长的时间）经验，才使人民相信这些企图一定会落空，才使无产阶级离开了孟什维克。

考茨基承认，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具有伟大前途的极好的战斗组织。既然这样，考茨基的整个立场也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

样倒塌了，像小资产者那种企图避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的幻想一样破灭了。因为整个革命是連續不断的而且是殊死的斗争，而无产阶级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先进阶级，是全体被压迫者求解放的一切愿望的焦点和中心。苏维埃是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机关，它反映和表现这些群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观点的改变，自然比其他任何机构迅速得多，充满得多，正确得多（这也就是苏维埃民主成为最高类型的民主的根源之一）。

苏维埃在1917年2月28日（旧历）至10月25日这段时间内，就召集了两次代表俄国绝大多数居民即代表全体工人和士兵以及十分之七八的农民的全俄代表大会，更不用说许许多多县、市、省、区域等地方代表大会了。在这段时间内，资产阶级没有能够召集一个代表大多数人的会议（除了那个显然伪造的、侮辱性的、引起无产阶级憎恨的“民主会议”之外）。立宪会议反映的群众情绪以及政治划分情况，同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六月代表大会）反映的完全一样。到召集立宪会议时（1918年1月），已经举行了苏维埃第二次（1917年10月）和第三次（1918年1月）代表大会，这两次代表大会十分清楚地表明：群众向左转了，革命化了，离开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就是说，他们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抛弃了同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转到无产阶级为推翻资产阶级而进行的革命斗争方面来了。

可见，单是苏维埃外表上的历史，就表明了解散立宪会议的必然性，表明了立宪会议的反动性。但是考茨基坚持他的“口号”：让革命死亡吧，让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吧，只要“纯粹民主”繁荣昌盛就行了！*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sup>①</sup>

---

① 只要作出公正的裁判，哪怕世界沉沦！——编者注

下面就是俄国革命史上各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简短总结：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	代表人数	其中布尔什维克的人数	布尔什维克所占的百分比
第一次(1917年6月3日)	790	103	13%
第二次(1917年10月25日)	675	343	51%
第三次(1918年1月10日)	710	434	61%
第四次(1918年3月14日)	1 232	795	64%
第五次(1918年7月4日)	1 164	773	66%

只要看看这些数字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替立宪会議辩护，或者談論（像考茨基那样談論）大多数居民不拥护布尔什维克，在我們这里只能令人发笑。

## 苏维埃宪法

我已經說过，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的和必要的标志。就是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提出这种专政的口号时，也并没有預先說要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专政的这个组成部分并不是依照某个政党的“計劃”出現的，而是在斗争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历史学家考茨基当然沒有觉察到这一点。他不了解，当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的人）在苏维埃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资产阶级自己就已經同苏维埃分离，抵制它，同它对峙，进行种种阴谋活动来反对它。苏维埃是在沒有任何宪法的情况下产生的，它成立了一年多（从1917年春至1918年夏）也还没有任何宪法。资产阶级仇視被压迫者的这种独立的和万能的（因为是包括所有人的）組織，资产阶级肆无忌惮、自私自利、卑鄙无耻地反对苏维埃，公开参加（从立宪民主党人到右派社

会革命党人，从米留可夫到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叛乱，——这一切造成了从苏维埃中正式排除资产阶级的情况。

考茨基听说过科尔尼洛夫叛乱，但是他竟大模大样地唾弃历史事实和决定专政形式的斗争进程、斗争形式。的确，既然讲的是“纯粹”民主，又何必管事实呢？因此，考茨基对取消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批评”是那样地……甜蜜、天真，如果这话是小孩说的，倒很可爱，但是一个尚未被公认为英才的人说出这种话来，就不免令人憎恶了。

……“如果资本家在普选制下落到了区区少数的地位，他们就会宁可顺从自己的命运”(第33页)……这不是说得很可爱吗？聪明的考茨基在历史上多次见过，并且一般从实际生活的观察中清楚地知道，竟有那种尊重大多数被压迫者意志的资本家和地主。聪明的考茨基坚持“反对党”的观点，即议会内斗争的观点。他真是一字不差地这样写的：“反对党”(第34页及其他许多页)。

呵，好一个博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你该知道，“反对党”是和平斗争而且只是议会斗争的概念，就是说，是适合非革命形势的概念，是适合没有革命的情况的概念。在革命中所遇到的是内战中的无情的敌人，——像考茨基那样害怕内战的小资产者无论发出怎样的反动的悲叹，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当资产阶级进行种种罪恶活动时(凡尔赛派及其同俾斯麦勾结的例子，对于任何一个不是以果戈里小说中的彼特鲁什卡<sup>①</sup>的态度对待历史的人来说，是多少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当资产阶级向外国求援并同它们一道进行反对革命的阴谋活动时，根据“反对党”的观点来看残酷的内

① 彼特鲁什卡(又译彼得尔希加)是果戈里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奴役，他爱读书，而且什么书都读，至于书中讲的是什么却不去了解，只要把字母换成字就行了。——译者注

戰問題，這真是笑話。革命的無產階級應當像“糊塗顧問”考茨基那樣，傻頭傻腦地把組織都托夫、克拉斯諾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軍團的反革命暴動並且付給怠工者千萬金錢的資產階級，看做合法的“反對黨”。呵，多么深奧的思想呵！

考茨基只是對問題的形式的法律的方面感到興趣，所以你一讀到他對蘇維埃憲法發表的議論，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倍倍爾的話來：法律家是彻頭徹尾的反動分子。考茨基說：“實際上，單把資本家變為無權的人是不行的。從法律上看，什麼是資本家呢？有產者嗎？甚至在德國這樣一個經濟非常進步、無產階級人數極多的國家里，成立蘇維埃共和國，也會使大量的人成為沒有政治權利的人。1907年，在德意志帝國的農業、工業、商業三大部門中從業的人及其家屬，屬於職員和雇佣工人這一類的約有3500萬人，屬於獨立經營者這一類的有1700萬人。可見，黨在雇佣工人中間，完全可以成為多數，但在全體居民中間則占少數。”（第33頁）

這是考茨基的典型議論之一。這難道不是資產者反革命的抱怨嗎？考茨基先生，你明明知道，俄國極大多數農民不雇用工人，因而也沒有被剝奪權利，你為什麼把全體“獨立經營者”都算做沒有權利的人呢？這難道不是捏造嗎？

你這位博學的經濟學家為什麼不引用你所熟悉的、1907年德國同一個統計關於農業中各類農戶使用雇佣勞動的數字呢？你為什麼不把表明剝削者有多少、表明剝削者在“農業主”總數中只占少數的德國統計材料，給那些讀你的小冊子的德國工人看看呢？

這是你們的叛徒立場使你變成了一個純粹是向資產階級獻媚的奴才。

你們看，資本家原來是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於是考茨基在好幾頁上攻擊蘇維埃憲法的“专橫”。這位“嚴肅的學者”容許英國資

产阶级用几世纪的时间制定和周密制定新的（对中世纪来说是新的）资产阶级宪法，而对于我们俄国工人和农民，这位奴才科学的代表却不给任何期限。他要求我们在几个月内就制定出极共周密的宪法……

……“专横”！请想一想，这种责难暴露出他向资产阶级献媚已经卑鄙到了极点，他那种迂腐已经到了极其愚钝的地步。资本主义国家那班十足资产阶级的而且大部分是反动的法律家，在几百年或几十年中周密地制定了极其详尽的条规，写了几十本几百本的法律和解释法律的书来限制工人，束缚穷人的手脚，对人民中的每个普通劳动者百般刁难和阻挠，呵，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考茨基先生却不认为这是“专横”！这是“秩序”和“法制”！这里的一切都想得周到，规定得完备，目的是要尽量把穷人的血汗“榨干”。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资产阶级的律师和官吏（考茨基根本不提这些人，想必是因为马克思非常重视打碎官吏机器的意义吧……），他们能把法律解释得使工人和一般农民永远逃不出法网。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横”，这不是自私自利、卑鄙龌龊、榨取民脂民膏的剥削者的专政。绝对不是。这是“纯粹民主”，一天比一天变得更为纯粹。

而当被剥削的劳动阶级，在因帝国主义战争而同国外兄弟们隔绝了的情况下，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号召被资产阶级压迫、被他们弄得闭塞、愚钝的群众起来进行政治建设，并已亲自开始建设新的无产阶级国家，在熾热斗争的烈火中、在内战的烽火中开始拟定出没有剥削者的国家的基本原则的时候，所有的资产阶级恶棍，所有的喝血的匪帮，以及他们的应声虫考茨基，就跑出来狂吠什么“专横”了！的确，这些无知的工人和农民，这班“小百姓”，怎能解释他们自己的法律呢？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得不到有学识的律师们的忠告，得不到资产阶级作家的忠告，得不到考

茨基之流和聪明的老官吏的忠告，怎么会有正义感呢？

考茨基先生从我的 1918 年 4 月 28 日的演說中引了一句話：……“群众自己决定选举的程序和日期”……于是“純粹民主派”考茨基推論道：

……“可見，大概每个选民會議都可以隨意規定选举程序。专横和排除无产阶级內部那些不好办的反对派分子的可能性，也就达到了最高的程度。”  
(第 37 頁)

說这种話，同資本家雇用的文巧看見群众在罢工时压迫“願意做工的”勤勉工人就大喊大叫，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純粹的”資產階級民主下，由資產階級一官吏決定选举程序，就不是专橫呢？为什么起来向來的剝削者作斗争的群众，在这个殊死斗争中受到教育和鍛煉的群众，他們的正义感就一定赶不上一小撮受資產階級偏見熏陶的官吏、知識分子和律师呢？

考茨基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你們可別怀疑这位最可敬的家长、这位最正直的公民的真誠。他热烈地堅定地拥护工人的胜利和无产阶级革命。他只是希望甜蜜蜜的知識分子市侩和傻头傻脑的庸人，在群众运动展开以前，在群众同剝削者作激烈斗争（絕對不要进行內戰）以前，先制定出一个溫和适度的革命发展章程……

我們这位极其博学的犹大什克·果洛夫廖夫<sup>①</sup>义憤填膺地对德国工人說，1918年 6 月 14 日全俄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代表們从苏維埃内开除出去。义憤填膺的犹大什克·考茨基写道：“这个措施不是針對犯了某种罪行

① 犹大什克·果洛夫廖夫(又譯猶大式加·戈洛維略夫)是薩爾蒂科夫-謝德林小說“果洛夫廖夫老爺們”中的一个极端自私、虛偽、殘酷、貪婪、愚蠢的地主。——譯者注

的某些个人…… 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没有提到苏维埃代表的不受侵犯权。在这里，从苏维埃内开除出去的不是某些个人，而是某些政党。”（第 37 頁）

是的，这的确可怕，这的确是不可容忍地抛弃了纯粹民主，而我們这位革命的犹大什克·考茨基就是要按照这种民主的規則干革命的。我們，俄国布尔什维克，應該先答應給薩文柯夫之流、李伯尔唐思<sup>22</sup>和波特列索夫之流（“积极派”）以不受侵犯权，然后再制定刑法，宣布参加捷克斯洛伐克軍团的反革命战争或在乌克兰和格魯吉亞同德帝国主义者勾結起来反对本国工人的人“应受惩治”，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我們才有权根据这种刑法并依照“纯粹民主”把“某些个人”从苏维埃内开除出去。不言而喻，通过薩文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尔唐思之流，或依靠他們的鼓动，从英法資本家手里領取金錢的捷克斯洛伐克軍团，以及在乌克兰和梯弗里斯的孟什維克帮助之下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枪械的克拉斯諾夫分子，在我們沒有制定出正确的刑法以前，就会安然坐在那里，并且会像最純粹的民主派那样，仅限于从事“反对党”的活动……

苏维埃宪法剥夺“以取得利潤为目的而使用雇佣工人”的人們的选举权，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样强烈的义憤。他写道：“有一个帮工的家庭手工业者或小业主，他的生活和感情可能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他沒有选举权。”（第 36 頁）

这是多么背弃“純粹民主”呵！这是多么不正义呵！固然，直到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并且用无数事实证明：小业主是最沒良心和最貪婪地剝削雇佣工人的人，但犹大什克·考茨基所指的，当然不是小业主阶级（究竟是誰臆造出有害的阶级斗争理論？），而是某些个人，是那些“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剝削者。人們认为早已死去的著名的“节儉的阿格尼斯”，又在考

茨基的笔下复活了。这位节俭的阿格尼斯是几十年以前“纯粹”民主派资产者欧根·李赫特臆造出来而传播于德国文坛的。他预言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剥削者的资本将引起无法形容的不幸，他摆出一副天真的面孔问道，从法律上看，什么是资本家呢？他以被凶恶的“无产阶级专政者”剥夺了最后一文钱的可怜的节俭的女裁缝（“节俭的阿格尼斯”）为例。有一个时期，整个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把纯粹民主派欧根·李赫特的这个“节俭的阿格尼斯”引为笑谈。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倍倍尔还活着，他曾坦白直爽地说，我们党内有很多民族自由主义者<sup>23</sup>；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时考茨基还没有成为叛徒。

现在，“节俭的阿格尼斯”又在“有一个帮工的、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小业主”身上复活了。凶恶的布尔什维克欺侮他，剥夺他的选举权。固然，在苏维埃共和国中，“任何一个选举大会”，像考茨基所说的那样，可以允许同该工厂有关系的贫苦工匠参加，只要他（作为例外）不是剥削者，只要他真正是“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但是难道能相信普通工人举行的既无秩序又无章程可遵循的（哎呀，真可怕呀！）工厂大会会有实际生活知识和正义感吗？与其冒险让工人欺侮“节俭的阿格尼斯”以及“生活和感情同无产阶级完全一样的工匠”，不如把选举权给一切剥削者，给一切雇佣工人的人，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 \*

让那些受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sup>①</sup>欢迎的卑鄙的叛徒坏

---

① 我刚才读了“法兰克福报”<sup>24</sup>（1918年10月22日第233号）的社论。这篇社论兴高采烈地轉述了考茨基的小册子的内容。交易所經紀人的报纸十分满意。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位同志从柏林写信告诉我，谢德曼之流的“前进报”<sup>25</sup>在一篇专論上說，它几乎对考茨基的每句话都赞同。恭喜！恭喜！

還去痛罵我們的剝奪剝削者的選舉權的蘇維埃憲法吧。這樣很好，因為這會加速和加深歐洲革命工人同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列諾得爾和龍格之流、韓德遜和拉姆賽·麥克唐納之流的分裂，同社會主義的老領袖和老叛徒的分裂。

被壓迫階級群眾，革命無產者的覺悟的忠實的領袖，一定會贊成我們。只要讓這些無產者和這些群眾知道了我們的蘇維埃憲法，他們立刻會說，這才真正是我們的人，這才真正是工人政黨，真正是工人政府。因為這個政府不像上述一切領袖們欺騙我們那樣用改良的空話欺騙工人，而是真正同剝削者進行鬥爭，真正實行革命，在實際上為工人的徹底解放而鬥爭。

既然蘇維埃在一年的“實踐”之後剝奪了剝削者的選舉權，那就是說，這些蘇維埃真正是被壓迫群眾的組織，而不是賣身給資產階級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和社會和平主義者的組織。既然這些蘇維埃剝奪了剝削者的選舉權，那就是說，蘇維埃不是小資產階級同資本家妥協的機關，不是進行議會空談（如考茨基、龍格和麥克唐納之流的空談）的機關，而是同剝削者作你死我活鬥爭的真正革命無產階級的機關。

一位消息灵通的同志幾天前（今天是10月30日）從柏林寫信告訴我：“這裡几乎沒有人知道考茨基的小冊子。”我倒想建議我國駐德國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書收購來，贈給覺悟的工人，以便聲討這個早已成了“臭尸”的“歐洲的”（應讀作：帝國主義的和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

\* \* \*

考茨基先生在書末（第61頁和第63頁）痛哭流涕地說：“新理論”（他這樣稱呼布爾什維主義，不敢提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巴黎公社的分析）“竟在像瑞士這樣的老民主國也找到了擁護者。”“如

果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接受这个理論”，在考茨基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

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革命群众在战争中受到了严重的教训，日益讨厌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了。

考茨基写道，“我們”向来是主张民主的，現在我們却忽然要拒絕它！

“我們”，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者，向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且科尔布之流早已公开这样说过。考茨基知道这一点，但他妄想向读者掩盖他已“回到”伯恩施坦和科尔布之流的“怀抱中”这一明显事实。

“我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沒有把“純粹”（资产阶级的）民主看做神圣的东西。大家知道，1903年普列汉諾夫还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他可悲地轉到俄国谢德曼的立场上去以前）。他在通过党纲的党代表大会上說，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要时将剥夺资本家的选举权，解散任何議会，如果这个議会成了反革命的議会。即使从我上面引用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論中，任何人都会看到，只有这种观点才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显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中得出来的。

“我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沒有向人民发表过各國考茨基主义者喜欢发表的那种言論，他們向资产阶级献媚，迎合资产阶级議会制，抹杀现代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只要求扩大这种民主，把这种民主貫彻到底。

“我們”对资产阶级說过：你們这些剥削者和伪君子，高談民主，同时却到处百般阻碍被压迫群众参与政治。我們抓住你們的話，为了这些群众的利益，要求扩大你們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以便使群众作好准备去进行革命，打倒你們这些剥削者。如果你们剥

削者企图反抗我們的无产阶级革命，我們就会无情地镇压你們，把你們变成沒有权利的人，不仅如此，还不給你們粮食吃，因为在我們无产阶级共和国中，剥削者将沒有权利，将沒有饭吃，因为我們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謝德曼式和考茨基式的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我們”革命馬克思主义者說过的和还要說的話，这就是被压迫群众一定会拥护我們、同我們在一起的原因，也是謝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一定会滚到叛徒的臭水坑去的原因。

## 什么是国际主义？

考茨基极端自信地认为自己是国际主义者，并自称为国际主义者。他宣布謝德曼之流是“政府派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既然为孟什維克辩护（他沒有公开說支持他們，但是完全宣揚他們的观点），也就十分清楚地暴露出他的“国际主义”是哪一类貨色了。考茨基不是单单一个人，而是在第二国际环境中必然产生的一个流派（法国的龙格，意大利的屠拉梯，瑞士的諾勃斯、格里姆、格拉貝和奈恩，英国的拉姆賽·麥克唐納等）的代表，因此，我們来研究一下考茨基的“国际主义”是大有教益的。

考茨基强调孟什維克也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得會議（这无疑是一张文凭，不过……这是一张陈腐的文凭），并且把他所同意的孟什維克观点描述如下：

……“孟什維克想实现普遍媾和。他們想要各交战国接受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依照这个观点，在这个目的沒有达到以前，俄国军队应当保持备战状态。布尔什維克却要求无论如何要立刻媾和，必要时准备单独媾和，他們为了力图强迫实现这一点，而加紧

瓦解本來已經瓦解得很厉害的軍隊。”(第 27 頁)考茨基认为，布尔什維克不應該夺取政权，而應該滿足于立宪會議。

总之，考茨基和孟什維克的国际主义就是：向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要求改良，但在所有交战国沒有接受不割地不赔款的口号以前，繼續支持这个政府，繼續支持它所进行的战争。无论屠拉梯分子也好，考茨基分子(哈阿茲等)也好，龙格之流也好，都屢次表示过这种观点，他們說：我們是主张“保卫祖國”的。

从理論上說，这是完全不善于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区别开来，这是在保卫祖國的問題上十足的糊塗观念。从政治上說，这是用市侩民族主义偷換国际主义，这是轉到改良主义方面，背弃革命。

从无产阶级观点看來，承认“保卫祖國”就是为現在的战争辩护，承认它是合理的。不管此刻敵軍是在我国境内或在他國境内，这次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不論是在君主国或在共和国)，既然如此，那末承认保卫祖國实际上就是支持帝国主义的强盗资产阶级，就是完全叛变社会主义。在俄国，即使是在克伦斯基时期，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战争也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进行这个战争的是占統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战争是“政治的繼續”)；从前沙皇同英法資本家訂立的瓜分世界和掠夺他國的秘密條約，特別清楚地說明了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

孟什維克把这次战争称为防御的或革命的战争，就是厚顏无耻地欺骗人民，而考茨基贊同孟什維克的政策，就是贊成欺骗人民，贊成小资产者愚弄工人，把工人束缚在帝国主义者的战車上，来为資本效劳。考茨基实行典型的市侩庸人政策，以为提出口号就能改变事情，并向群众灌輸这种荒謬思想。全部资产阶级民主史打破了这种幻想，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为了欺骗人民，过去和现在总是什么“口号”都提得出来的。問題是要考察他們的誠意，把

他們的言論和他們的行動加以比較，不要滿足于唯心主義的或騙人的空話，而要徹底找到階級的現實。要使帝國主義戰爭不再成為帝國主義戰爭，不能依靠騙子、空談家或市儈庸人提出一些甜蜜的“口號”，只有實際打倒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同這次戰爭有千絲萬縷的（甚至千繩萬索的）經濟聯繫的階級，只有真正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起來掌握政權。不然就無法擺脫帝國主義戰爭，也无法擺脫帝國主義的掠奪性的和平。

考茨基贊成孟什維克的對外政策，宣布這個政策是國際主義的、齊美爾瓦爾得派的政策，第一、這樣他就充分暴露了齊美爾瓦爾得多數，即機會主義多數的腐朽（難怪我們齊美爾瓦爾得左派<sup>26</sup>當時就同這個多數分開了！）；第二、——這是最重要的——考茨基從無產階級立場轉到了小資產階級立場，從革命的立場轉到了改良主義的立場。

無產階級爭取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則爭取在服從帝國主義的條件下用改良主義手段“改善”帝國主義，適應帝國主義。當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時候，例如在1909年寫“取得政權的道路”的時候，他堅持的正是戰爭必然引起革命這一思想，他說過革命紀元正在臨近。1912年的巴塞爾宣言<sup>27</sup>直接而明確地指出，德英兩大集團的帝國主義戰爭（這次戰爭果然在1914年爆發了）將引起無產階級革命。可是當1918年由於戰爭而爆發革命的時候，考茨基却不去說明革命的必然性，不去周密思索和徹底考慮革命的策略以及準備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反而把孟什維克的改良主義策略叫作國際主義。難道這不是叛徒行徑嗎？

考茨基贊揚孟什維克主張軍隊保持備戰狀態，責備布尔什維克加緊“瓦解”本來已經瓦解得很厲害的軍隊。這也就是贊揚改良

主义，赞扬服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而责备革命，背弃革命。因为在克伦斯基统治下，保持备战状态，就意味着而且实际上就是保持资产阶级（虽然是共和派资产阶级）指挥的军队。大家知道，而且事变的进程也明显地证实，这个共和派军队由于保留了科尔尼洛夫的军官而保持了科尔尼洛夫的精神。资产阶级的军官不能不是科尔尼洛夫派的，不能不倾向于帝国主义，倾向于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照旧保持帝国主义战争的一切基础，保持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基础，修补细节，粉饰小事（“改良”），——孟什维克的策略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如此。

事情完全相反，没有一个大革命是不“瓦解”军队的，而且不这样也不行。因为军队是支持旧制度的最顽固的工具，是维护资产阶级纪律、支持资本统治、保持并培养劳动者对资本的奴隶般的驯服和顺从的最坚固的柱石。反革命派从来不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装工人和军队同时并存。恩格斯说过，法国在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了的，“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sup>28</sup> 武装工人是新军队的萌芽，是新社会制度的组织细胞。破坏这个细胞，不让它发展起来，——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第一个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着重指出，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个信条就是破坏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代替它<sup>29</sup>。上升到统治地位的新的社会阶级，如果不使旧军队完全解体（即反动的或纯粹是胆小的市侩对此叫喊的所谓“瓦解”），不经历一个没有任何军队的最困难最痛苦的时期（法国大革命就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时期），不在艰苦的内战中逐渐建立起新阶级的新军队、新纪律、新军事组织，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能取得和巩固这种统治地位。历史学家考茨基从前是懂得这一点的。叛徒考茨基却忘记了这一点。

既然考茨基贊同孟什維克在俄国革命中的策略，他又有什么权利称謝德曼分子为“政府派社会主义者”呢？孟什維克拥护克伦斯基，加入他的内閣，也就同样是政府派社会主义者了。只要考茨基試图提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統治阶级的問題，他就絕對迴避不了这个結論。然而考茨基避免提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所必須提出的关于統治阶级的問題，因为仅仅是提出这个問題，叛徒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德国的考茨基派、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都这样推論說：社会主义是以民族平等自由、民族自决为前提的，所以当我们們国家遭到进攻或者敵軍侵入我国領土时，社会主义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保卫祖国。从理論上看，这种推論或者完全是侮辱社会主义，或者是騙人的遁辞；而从政治实践上看，这种推論同那些对战争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对革命政党在反动战争期間的任务連想也不会去想的十分无知的庄稼汉的推論是一样的。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爭辯的。而且社会主义还一般地反对对人使用暴力。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以外，誰也沒有由此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談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區別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簡直是用詭辯来自欺欺人。

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問題也是这样。一切战争都是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社会主义者贊成革命战争。战争的阶级性——这就是摆在社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面前的基本問題。1914—1918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赃、为了掠夺和扼杀弱小民族而进行的战争。1912 年的巴塞尔宣言就是这样估計战争的，事实也证实了这

种估計。誰不这样看战争，誰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如果威廉統治下的德国人或克列孟梭統治下的法国人說，敌人侵入了我国，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有权利和义务保卫祖国，那末这就不是社会主义者的推論，不是国际主义者的推論，不是革命无产者的推論，而是市侩民族主义者的推論。因为在这种推論中，工人反对資本的革命阶级斗争不見了，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着眼对整个战争的估計不見了，就是說，国际主义不見了，剩下的只是偏狭的頑固的民族主义。我国受欺凌了，其他一切我都不管——这就是这种推論的結論，这就是它的市侩民族主义的狹隘性。这正像一个人看到对个人使用暴力，就說：社会主义是反对暴力的，因此，我宁可叛变，也不坐牢。

假如一个法国人、德国人或意大利人說：社会主义是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的，因此，敌人侵入我的国家，我就要起来自卫，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因为这种人只看見自己的“国家”，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看得高于一切，而沒有考慮到使战争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使他的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掠夺锁鏈的一环的国际联系。

所有的市侩和愚昧无知的庄稼汉正是像考茨基派、龙格派、屠拉拂派等等叛徒那样推論的：敌人进入我国了，其余一切我都不管①。

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者的推論則不同：战争

① 社会沙文主义者（諾德曼之流、列席得尔之流、韓德逊之流、莫帕斯之流等等）在战争期间根本不談“国际”。他們认为反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他們赞成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侵略政策。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市侩和平主义者）表现出一切“国际主义”的情感，奋起反对兼并等等，但实际上继续支持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两类人的差别很小，正像凶恶恶毒的资本家和花言巧语的资本家的差别一样。

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这个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个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一切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是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屠杀的惨祸的唯一出路。我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观点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推论。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这也就是叛徒考茨基“忘记了”的常識。当考茨基从赞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俄国的孟什维克，法国的龙格派，意大利的屠拉梯派，德国的哈阿兹派)的策略转到批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时，他的叛徒行径就更加明显了。请看他的批评：

“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建筑在这种假设上面：这个革命将是欧洲普遍革命的出发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唤醒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

既然这样假设，俄国的单独媾和将采取什么形式，这种媾和将使俄国人民遭受多少苦难，损失多少领土(原文是 Verstümmelungen，即残缺或割裂)，以及将怎样解释民族自决，当然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俄国能不能自卫，也是没有关系的。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捍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

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成为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的手段。

只要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基本假设能够成立，所有这些都很合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

直到现在，这种假设还没有得到证实。于是人们责备欧洲无产者，说他

們拋棄和出卖了俄国革命。这种責备簡直是无的放矢，因为这究竟是要誰來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行动負責呢？”（第 28 頁）

往下考茨基再三补充說，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曾不止一次地对他們所期待的革命的到来估計错了，但是他們从来没有把他們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在一定时期內”发生革命上面（第 29 頁），而布尔什維克却“把一切都押在欧洲普遍革命这一张牌上”。

我們故意摘引这样长的一段話，好让讀者清楚地看到，考茨基怎样“巧妙地”伪造馬克思主义，用卑鄙的反动的市侩观点偷換馬克思主义。

第一、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論敵身上，然后加以駁斥，这是不大聪明的人使用的手法。如果布尔什維克真是把他們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內发生革命上面，那当然是愚蠢的。但布尔什維克党并没有做过这样的蠢事。我在給美国工人的信（1918 年 8 月 20 日）中直接排斥了这种愚蠢思想，我說，我們指望美国革命，但并不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內发生。我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共产党人”論战的时候（1918 年 1—3 月），屡次發揮了这种思想。考茨基玩了一套小小的……很小的歪曲事实的把戏，他对布尔什維主义的批评就是建筑在这套把戏上面的。考茨基把指望欧洲革命在較短时期內但不是在一定时期內发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內发生的策略混为一談了。这是一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捏造！

后一种策略是愚蠢的。前一种策略是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革命的无产者和国际主义者必須采取的，其所以必須，因为只有这种策略才是用馬克思主义观点正确地估計了战争在欧洲各国造成的客观情况，只有这种策略才符合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任务。

考茨基用关于布尔什維克革命家可能犯但并沒有犯的一种錯

誤的小問題，偷換了關於整個革命策略的基礎的大問題，從而安然無事地背離了整個革命策略！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論上甚至不能提出關於革命策略的客觀前提的問題。

現在我們來談第二點。

第二、如果歐洲有革命形勢存在，馬克思主義者就必須指望歐洲革命。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策略在有革命形勢時和沒有革命形勢時是不能一樣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真理。

考茨基要是提出這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提出的問題，他就会看到，問題的答案必然是反對他的。在戰前很久，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一切社會主義者都認為，歐洲戰爭一定會造成革命形勢。當考茨基還不是叛徒的時候，他在1902年（在“社會革命”一書中）和1909年（在“取得政權的道路”一書中）都明確地承認過這一點。用整個第二國際的名義發表的巴塞爾宣言也承認了這一點。難怪各國社會沙文主義者和考茨基分子（即動搖於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之間的“中派”）都像害怕火一樣，害怕巴塞爾宣言中有關的聲明！

可見，期待歐洲革命形勢，並不是布爾什維克的痴心妄想，而是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的共同意見。考茨基大談布爾什維克“向來相信暴力和意志的萬能”，以此來迴避這個无可爭辯的真理，這正是用無聊的空話來遮蓋他那避而不提革命形勢問題的可恥行為。

其次，革命形勢是不是真正到來了呢？這個問題考茨基也沒有能夠提出來。經濟事實回答了這個問題：戰爭在各地造成的飢荒和經濟破壞，這就是革命形勢。政治事實也回答了這個問題：從1915年起，在所有國家里清楚地顯露出陳舊腐朽的社會黨分裂的過程，無產階級群眾離開社會沙文主義領袖向左轉，轉到革命思想、革命情緒、革命領袖方面來的過程。

1918年8月5日考茨基写他的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只有害怕革命、叛变革命的人才会看不見这些事实。現在呢，在1918年10月底，大家都看見，欧洲許多国家的革命在极迅速地发展。希望人家照旧把他看成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成了十分近視的庸人（像1847年的被馬克思所譏笑的庸人一样），看不見日益迫近的革命！

現在我們來談第三点。

第三、在欧洲有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革命策略有什么特点呢？变成了叛徒的考茨基害怕提出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提出的这个問題。考茨基像一个典型的庸人市侩或无知的农民那样推論：“欧洲普遍革命”来到了沒有呢？如果来到了，那他也願意做一个革命者！但是那时候，我們可以說，所有的混蛋（正像現在有时混进得了胜利的布尔什維克队伍里的坏蛋一样）都会宣布自己是革命者！

如果没有到来，考茨基就要离开革命！考茨基絲毫不懂得这个道理：革命馬克思主义者不同于庸人和市侩的地方，在于他有本領向无知的群众宣传正在成熟的革命必然到来，证明它的不可避免，說明它对人民的好处，准备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去进行革命。

考茨基把謬論加到布尔什維克身上，說他們指望欧洲革命将在一定时期內到来，而把一切都押在这一张牌上。这种謬論正是反对考茨基自己的，因为从他的話里正好得出这样的結論：如果欧洲革命在1918年8月5日以前到来，布尔什維克的策略就是正确的！考茨基指的正是他写这本小册子的日子。而在8月5日过去几个星期以后，可以看出欧洲許多国家的革命正在到来，于是考茨基的全部叛徒行徑，他伪造馬克思主义的全部行为，他在用革命

观点推論問題、甚至用革命观点提出問題方面的笨拙无能，就暴露无遗了！

考茨基写道：有人責备欧洲的无产者叛变，这种責备簡直是无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你错了！你拿镜子照一照，就会看到这个矢所对准的“的”究竟是誰。考茨基做出天真的样子，假裝不知道，是誰在这样責备，这个責备又是什么意思。其实考茨基明明知道，是德国的“左派”，斯巴达克派<sup>30</sup>，即李卜克內西和他的朋友在責备，而且現在还在这样責备。这种責备表示一种明确的認識：德国无产阶级扼杀芬兰、乌克兰、拉脫維亞、爱斯兰，也就是背叛了俄国的（和国际的）革命。这首先和主要不是責备一向受压抑的群众，而是責备謝德曼和考茨基这类領袖，因为这些領袖沒有履行自己的天职，沒有到群众中去进行革命鼓动、革命宣传和革命工作以反对群众的保守心理，因为这些領袖的活动实际上违反被压迫阶级群众中永远蘊蓄着的革命本能和志向。謝德曼分子公开地、粗暴地、无耻地、多半是自私自利地出卖了无产阶级，轉到了资产阶级方面。考茨基派和龙格派也是这样干的，不过他們犹豫动摇，畏首畏尾地望着此刻强有力的人物。考茨基在战争期间写的一切著作都不是支持和发揚革命精神，而是扑灭革命精神。

考茨基竟不了解，“責备”欧洲无产者出卖了俄国革命，具有何等巨大的理論意义，尤其具有何等巨大的宣传鼓动意义，——这一点簡直可以成为德国正式社会民主党“中間”領袖的市侩愚蠢的历史紀念碑了！考茨基不了解，在德意志“帝国”书报检查条件下，这种“責备”几乎是沒有背叛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內西和他的朋友們能用来号召德国工人的唯一的形式，他們号召德国工人抛弃謝德曼分子和考茨基分子，推开这些“領袖”，摆脱他們那

种使人愚鈍、使人庸俗的說教，不管他們，不理會他們，越过他們，而走向革命，进行革命！

考茨基不了解这一点。他哪里能了解布尔什維克的策略呢？能不能指望一个根本背弃革命的人会权衡和估量革命在一种最“困难”場合的发展条件呢？

布尔什維克的策略是正确的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不是建筑在害怕世界革命的怯懦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不相信”世界革命的市侩心理上面，不是建筑在只保卫“自己”祖国（自己的资产阶级的祖国）而对其余一切加以“唾弃”的狭隘民族主义願望上面，而是建筑在对欧洲革命形势的正确的（在战前，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变节以前，是一致公认的）估計上面。这个策略是唯一国际主义的策略，因为它尽力做到在一个国家內所能做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这个策略的正确已为大量成就所证实，因为布尔什維主义已經成为世界的布尔什維主义（这次不是由于俄国布尔什維克的功劳，而是由于各地群众对真正革命的策略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它提供了与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有具体的，实践上的不同的思想、理論、綱領和策略。布尔什維主义彻底粉碎了謝德曼和考茨基、列諾得爾和龙格、韓德逊和麦克唐納之流的陈旧腐朽的国际，現在这些人梦想“統一”，使死尸复活，可是步調不一，互相妨碍。布尔什維主义建立了第三国际的思想基础和策略基础，这个国际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和真正共产主义的国际，它既估計到和平时代的成就，也估計到已經开始了的革命时代的經驗。

布尔什維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普及到了全世界，把这个詞先从拉丁文譯成俄文，以后又譯成世界各种文字，并且以苏维埃政权这个实例表明：甚至一个落后国家中最缺少經驗、最缺少

教育、最缺少組織習慣的工人和貧苦农民，都能够在整整一年內，在极大的困难当中，在同剥削者（受到全世界資產階級支持的剥削者）作斗争中，保持住劳动者的政权，建立起比世界上以往的一切民主都更高更广得不可計量的民主，开始千百万工人农民在实际实现社会主义方面的創造活動。

布尔什維主义在实际上强有力地促进了欧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这是迄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沒有做到的。全世界工人口益清楚地看到，謝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策略沒有使他們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制，这种策略不能成为供世界各国效法的模范；同时，全世界无产者群众日益清楚地看到，布尔什維主义指出了摆脱战争慘禍和帝国主义的正确道路，布尔什維主义是可供各国效法的策略模范。

不仅全欧洲而且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在成熟着，这是大家都看到的；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則帮助了它，加速了它，支援了它。这一切对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还不够嗎？当然不够。一个国家是不能作出更多的事情来的。但是这一个国家，由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就假設世界帝国主义通过德帝国主义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勾結，明天摧毁了俄国苏维埃政权，就假設有这种最坏最坏的情形，布尔什維克的策略也还是給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利益，还是支持了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

### 在“經濟分析”的幌子下为 資产阶级效劳

上面已經說过，如果要名副其实，考茨基的书就不應該叫做“无产阶级专政”，而應該叫做“附和資产阶级对布尔什維克的

攻击”。

孟什維克关于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旧“理論”，就是說，孟什維克对馬克思主义的旧歪曲（即 1905 年被考茨基駁倒的歪曲！），現在又被我們这位理論家撿了起来。不管这个問題对俄国馬克思主义者怎样枯燥无味，我們还是得談一談。

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俄国所有的馬克思主义者在 1905 年以前都是这样說的。孟什維克用自由主义偷換馬克思主义，由此得出結論說：可見，无产阶级不應該超出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范围，它應該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布尔什維克說，这是自由资产阶级的理論。资产阶级力求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即用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改造国家，尽可能地保持君主制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等等。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让自己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束缚”。布尔什維克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对比是这样表述的：无产阶级联合农民，中立自由资产阶级，彻底摧毁君主制、中世纪制度和地主土地占有制。

无产阶级同一般农民的联合，也就表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因为一般农民就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小生产者。布尔什維克当时就补充說，接着是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半无产阶级（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中立中农，推翻资产阶级，这就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见我在 1905 年写的“两种策略”一书，重新刊载于 1907 年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中）。

1905 年考茨基间接参加了这次爭論，他就当时的孟什維克普列汉諾夫提出的詢問，发表了实质上是反对普列汉諾夫的意見，結果引起了布尔什維克刊物上的特別譏笑。現在考茨基只字不提那时的爭論（害怕他自己的話揭露他自己），从而使德国讀者根本无法了解問題的实质。考茨基先生在 1918 年不能告訴德国工人，他

在 1905 年曾怎样主张工人要同农民联合，而不要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他当时根据什么条件维护过这种联合，他为这个联合拟定了什么纲领。

开了倒车的考茨基，现在却在“经济分析”的幌子下，傲慢地大谈“历史唯物主义”，为工人服从资产阶级的主张辩护，引证孟什维克马斯洛夫的言论，来反复咀嚼孟什维克的陈旧的自由主义观点；同时又用引文证明关于俄国落后的新思想，从这种新思想得出的却是旧结论，其精神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應該比资产阶级走得更远！这根本违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較 1789—1793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 1848 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说的～切<sup>31</sup>！

談到考茨基的“經濟分析”的主要“論據”和主要内容之前，我們先要指出，他的头几句話就表現出作者的思想已混乱或浅薄到了可笑的地步。

我們这位“理論家”一本正經地說：“直到現在，俄国的經濟基础还是农业，而且正是小农生产。以此为生的居民約占 $\frac{4}{5}$ ，甚至可能占 $\frac{5}{6}$ 。”（第 45 頁）第一、可爱的理論家，你想过沒有，在这大批的小生产者中間究竟会有多少剥削者呢？当然，不超过总数的 $\frac{1}{10}$ ，而在城市中还更少，因为城市的大生产較为发达。就拿大得不可思議的数字來說，假定 $\frac{1}{5}$ 的小生产者是剥削者，沒有选举权，那也可以看出，在苏維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占 66% 的布尔什维克是代表大多數居民的。此外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大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直拥护苏維埃政权，就是說，基本上是全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拥护苏維埃政权，到 1918 年 7 月，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冒险的暴动，于是从他們原来的党内分裂出来的两个新党就同他們分开了，这两个新党是“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sup>32</sup>（組成这两个新党的，是一些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們曾經

由旧党提出来担任国家要职，例如属于前一党的有查克斯，属于后一党的有柯列加也夫）。可見，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无意中推翻了！——他所說的贊成布尔什維克的似乎是少数居民这种可笑的童話。

第二、可爱的理論家，你是否想过，小农生产者必然动摇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間呢？这个为欧洲全部现代史所证实的馬克思主义真理，被考茨基恰巧“忘記了”，因为它把考茨基一再重复的孟什维克的全部“理論”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沒有“忘記”这一点，他就不能否认在小农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必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

現在来看看我們这位理論家的“經濟分析”的主要内容吧。

考茨基說，苏维埃政权是一种专政，这是无可爭論的。“但这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呢？”（第 34 頁）

“按照苏维埃宪法，在有权参加立法和管理的居民中間，农民占大多数。如果把人們說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东西贯彻下去，如果一般說来，一个阶级能够直接实现只有政党才能实现的专政，那它就会是农民专政。”（第 35 頁）

善良的考茨基非常滿意这个很深奥很机灵的推論，他企图挖苦人說：“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最无痛苦的实现，似乎只有交给农民才有保证。”（第 35 頁）

我們这位理論家引用了半自由主义的馬斯洛夫的許多非常深奥的話，來极詳細地证明一种新思想：农民从利益上关心粮价高，关心城市工人的工资低，等等。附带說一下，对于战后时期的真正新現象注意得愈少，这种新思想就叙述得愈是枯燥无味；这些現象就是：例如农民出卖粮食不是要錢而是要商品，农民的农具不够，而且用多少錢也买不到所需数量的农具。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特別讲到。

总之，考茨基责备布尔什维克，责备无产阶级政党，说它把专政、把实现社会主义的事业交到小资产阶级农民手里了。考茨基先生，妙极了！据你的高见，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农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家想必是记起了“开口如银，闭口如金”的格言，觉得还是默不作声为妙。但是考茨基在下述推论中露出了马脚：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农民苏维埃是全体农民的组织。现在这个共和国宣布，苏维埃为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组织。富裕农民失去了苏维埃的选举权。贫苦农民在这里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社会主义土地改革的经常的、大量的产物。”（第48页）

多么厉害的讽刺呵！在俄国，从任何一个资产者的口里都可以听到这种讽刺，他们都幸灾乐祸，嘲笑苏维埃共和国公开承认贫苦农民的存在。他们嘲笑社会主义。这是他们的权利。但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居然嘲笑我国在四年大破坏的战争之后有贫苦农民存在（而且还将长期存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叛变之风盛行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

再往下看吧：

……“苏维埃共和国干涉富有农民和贫苦农民的关系，不过不是用重新分配土地的办法。为了消除市民缺粮现象，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夺取富有农民的余粮。这种粮食一部分给市民，一部分给贫苦农民。”（第48页）

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一想到这种办法会推行到大城市的郊区以外（现在这种方法在我国已推行到全国了），自然是愤慨得很。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带着庸人的无与伦比的、令人赞叹的冷淡（或愚钝）态度，用教训的口吻说道：……“这些办法（剥夺富裕农民）把不安和内战的新因素带进生产

过程”……(把内战带进“生产过程”，这真是一种超自然的现象!)……“要使生产过程健全起来，迫切需要安宁和安全。”(第49页)

是的，是的，为了那些隐藏余粮、破坏粮食垄断法、使城市居民挨饿的剥削者和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当然是该叹息和流泪的。考茨基、海因里希·维贝尔<sup>33</sup>(维也纳)、龙格(巴黎)和麦克唐纳(伦敦)之流先生们，都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我们都主张工人阶级革命，只是……只是不要破坏粮食投机者的安宁和安全！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援引“生产”过程来掩盖这种为资本家效劳的卑鄙龌龊的行为……如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才是向资产阶级阿谀献媚呢？

请看我们这位理论家竟说了些什么。他责备布尔什维克把农民专政冒充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责备我们把内战带进农村(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功绩)，把武装的工人队伍派往农村，去公开宣布实行“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专政”，帮助贫苦农民，剥夺投机者、富有农民违反粮食垄断法而隐藏起来的余粮。

一方面，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纯粹民主，主张革命阶级即被剥削劳动者的领袖服从多数居民(因而也包括剥削者在内)。另一方面，他反对我们，说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性的，其所以是资产阶级性的，是因为农民整个说来都站在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面，他同时又自以为是在维护无产者的、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这不是“经济分析”，而是头等的糊塗和混乱。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片断的自由主义学说，是鼓吹向资产阶级和富农献媚。

这个被考茨基弄得一团糟的问题，布尔什维克早在1905年就

完全闡明了。是的，當我們同全体农民一起前进时，我們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這是我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的，是我們从 1905 年以来說过千百次的，我們从来没有試圖跳过历史过程的这个必經阶段，也沒有試圖用法令把它取消。考茨基拚命想在这一点上“揭露”我們，結果只是揭露了他自己的观点是混乱的，揭露了他害怕回忆起他在 1905 年还不是叛徒时所写的东西。

可是，在 1917 年，从 4 月起，即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在我們夺取政权以前很久，我們就已公开說过并向人民解釋过：現在革命不能停留在这里，因为国家已前进了，资本主义已前进了，經濟破坏已达到空前的程度而要求（不管誰願不願意）向前迈进，走向社会主义。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前进，就不能拯救备受战争摧殘的國家，就不能減輕被剥削劳动者的痛苦。

結果正同我們所說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們的論斷是正確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紀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貧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間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端地歪曲馬克思主义，把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馬克思主义。这就是用假学者的态度借口资产阶级比中世紀制度进步，来暗中对资产阶级进行反动的辩护，以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

順便指出，蘇維埃所以是最高的民主制形式和类型，正因为它把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吸引他們参与政治，它是最接近“人民”（指馬克思在 1871 年談到真正人民革命时所說的“人民”的含义）<sup>34</sup>、最

灵敏地反映群众在政治上阶级上的成熟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晴雨表。苏维埃宪法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写出的，不是在书房里制定的，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法律家强加在劳动群众身上的东西。不，这个宪法是在阶级斗争发展进程中随着阶级矛盾的成熟而成长起来的。考茨基所不能不承认的那些事实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起初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正是由于贫苦农民不开展、落后、无知，领导权才落到了富农、有钱人、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里。这是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有考茨基那样的傻瓜或叛徒，才会认为这两种人是社会主义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小资产阶级必然地、不可避免地动摇于资产阶级专政（克伦斯基，科尔尼洛夫，萨文柯夫）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因为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经济地位的根本特性，不能采取任何独立行动。顺便说一下，考茨基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分析俄国革命时，用法律上形式上的“民主”概念，用帮助资产阶级掩盖它的统治、欺骗群众的“民主”概念来支吾搪塞，忘记了“民主”实际上有时表现资产阶级专政，有时表现服从这个专政的市侩的软弱无力的改良主义等等。照考茨基看来，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资产阶级政党，有领导无产阶级大多数，即无产阶级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但是没有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没有阶级根源，即没有小资产阶级根源！

小资产阶级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动摇，启发了群众，促使他们的绝大多数、一切“下层”、一切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离开了这样的“领袖”。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到1917年10月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占了优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内部的分裂加剧了。

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动摇的终结，意味着君主制

和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完全破坏（这种土地占有制在十月革命以前还没有破坏）。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起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能显现出来。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

这个过程在1918年夏秋两季得到了发展。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反革命暴动唤醒了富农。富农暴动波及全俄国。贫苦农民不是从书本上，不是从报纸上，而是从实际生活中知道他们的利益同富农、有钱人、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能调和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反映了群众的动摇，并且正是在1918年夏天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走在一起（在莫斯科举行暴动，普罗相占据了电报局——占据了一小时！——向全国宣告布尔什维克已被推翻；后来，讨伐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集团军总司令穆拉维约夫又实行叛变等等）；另一部分人，即上面讲过的那一部分人，仍然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

城市缺粮情况的严重，日益尖锐地提出了粮食垄断问题（理论家考茨基在自己的经济分析中重弹十年前马斯洛夫的旧调，“忘记了”粮食垄断这件事！）。

地主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民主共和制的旧国家，常常把实际受资产阶级支配的武装队伍派到农村去。这是考茨基先生不知道的！他不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政”，绝对不是！这是“纯粹民主”，尤其是资产阶级议会赞成这样做的时候！在1917年夏秋两季，阿夫克森齐也夫、谢·马斯洛夫同克伦斯基分子、策烈铁里等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起逮捕过土地委员会委员，这一事实考茨基“没有听说过”，他对这件事实只字不提！

全部问题在于，通过民主共和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

級國家，不能在人民面前承认这个国家是为資产阶级服务的，不能說真話，不能不戴上假面具。

巴黎公社类型的國家，苏維埃國家，則公开直接地对人民說真話，声明它是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的专政，并且正是用这样的真話把在任何民主共和制下都是受压抑的千百万新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通过苏維埃吸引他們参与政治、民主和国家管理。苏維埃共和国从两个京都把武装工人队伍，首先是把比較先进的武装工人队伍，派到农村去。这些工人把社会主义带到农村，把貧农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組織他們，教育他們，帮助他們鎮压資产阶级的反抗。

凡是了解情况和到过农村的人都說，俄国农村本身只在 1918 年夏秋两季才經历“十月”（即无产阶级）“革命”。轉折点到了。富农暴动的浪潮被貧农的奋起、“貧农委员会”的发展所代替。在军队中，工人出身的政治委员，工人出身的軍官、师长和集团軍司令多起来了。正当傻瓜考茨基被 1918 年的七月危机<sup>35</sup>和資产阶级的狂吠所吓倒，像“小公鸡”那样跟着資产阶级跑，写了一整本小册子，深信布尔什維克正处在被农民推翻的前夕，正当这个傻瓜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退出看作拥护布尔什維克的人的范围“縮小了”（第 37 頁）的时候，布尔什維主义拥护者的实际范围却在无限地扩大，因为千百万貧农正在觉醒起来，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摆脱富农和农村資产阶级的监护和影响。

我們失去的是几百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无气节的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富农，得到的却是几百万貧农<sup>36</sup>。

在两个京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一年以后，穷乡僻壤的无产

① 在苏維埃第六次代表大会（1918 年 11 月 6~9 日）上，有表决权的代表 967 人，其中有布尔什維克占 950 人，右派资产阶级代表 361 人，其中布尔什維克占 355 人。加在一起，布尔什維克占总数 97%。

階級革命，在它的影響和幫助下發生了，最終地鞏固了蘇維埃政權和布爾什維主義，最終地證明了國內已經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反對布爾什維主義。

俄國無產階級同全體農民一起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就最終地過渡到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時它分裂了農村，把農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使他們聯合起來反對富農和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農民資產階級。

假如兩個京都和大工業中心的布爾什維主義無產階級不能把貧農團結起來反對富有農民，那就證明俄國還“沒有成熟”到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農民仍旧是一個“整體”，就是說在經濟上政治上精神上仍旧受富農、有錢人、資產階級領導，革命就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但是要附帶說一句，即使這樣，也不能證明無產階級不應該奪取政權，因為只有無產階級才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真正進行到底了，只有無產階級才為推進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只有無產階級才建立了蘇維埃國家，它是繼巴黎公社之後走向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步。）

另一方面，假如布爾什維主義無產階級不等待農村的階級分化，沒有準備和實行這種分化，在1917年10—11月間就立刻試圖“命令”在農村中進行內戰或“實行社會主義”，而不同全體農民結成暫時的同盟（聯盟），不向中農作一系列讓步等等，那就是用布爾基主義<sup>36</sup>歪曲馬克思主義，那就是少數人企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多數人，那就是在理論上荒謬絕倫，不了解全體農民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革命，不了解在落後的國家里不經過許多過渡，不經過許多過渡階段，就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變成社會主義革命。

考茨基在這個最重要的理論和政治問題上把一切都弄亂了，而在實踐上簡直成了資產階級的奴才，大叫大嚷地反對無產階級

专政。

\* \* \*

另一个极有意义极重要的問題，也被考茨基弄得同样混乱，也許更加混乱。这个問題就是：苏維埃共和国在土地改革这一极困难的也是极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革方面的立法活动，在原則上是否提得正确，其次，实行得是否适当？西欧任何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过最重要的文件，对我們的政策提出批評，我們是感激不尽的，因为这样做，是对我們极大的帮助，也是对全世界正在成熟的革命的帮助。但考茨基不是进行批評，而是制造极大的理論混乱，把馬克思主义变成自由主义，实际上则是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空洞的、恶毒的、庸俗的攻击。让讀者去判断吧：

“大地产不能保持下去了。这是革命造成的。这是馬上就很清楚的事情。不能不把大地产交给农民了”……（不对，考茨基先生，你把你认为是“很清楚的事情”代替了各个阶级对这个問題的态度；革命历史证明，资产者同小资产者既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組成的联合政府，执行的是保持大地产的政策。謝·馬斯洛夫的法令和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sup>37</sup> 尤其证明了这一点。沒有无产阶级专政，“农民”就战胜不了同资本家联合起来的地主。）

……“但是这应当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却沒有一致的意見。可以設想不同的解决办法”……（考茨基最关心的是“社会主义者”的“一致”，而不管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是誰。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基本阶级一定会有不同的解决办法，他却忘記了。）……“从社会主义观点看來，最合理的办法是把大企业收归国有，然后交给一直在这些企业里当雇佣工人的农民，由他們用协作社的形式經營这些大山庄。但是采取这个办法要有农业工人，而俄国則沒有农业工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大地产收归国有，然后把它分成小

块租給少地的农民。这样也許还会實現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考茨基仍像往常那样，用那套出名的办法来搪塞：一方面，不能不意識到，另一方面，應該承认。他把各种解决办法排在一起，不去考慮——唯一现实地、唯一合乎馬克思主义地考慮——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應該是一些怎样的过渡。俄国农业雇工人，但人数不多，至于苏維埃政权提出的怎样过渡到公社耕种制和协作耕种制的問題，考茨基竟一字不提。但最可笑的是考茨基想把小块土地的出租看成有“一些社会主义成分”。其实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其中絲毫也沒有“社会主义成分”。如果出租土地的“国家”不是巴黎公社类型的国家，而是資产阶级議会制共和国（考茨基經常設想的正是这样的国家），那末出租小块土地就是典型的自由主义的改良。

对于苏維埃政权废除了一切土地私有制这一点，考茨基則默不作声。更坏的是，他还玩了一套难以置信的伪造手法，在摘引苏維埃政权的法令时，把最重要的地方丢掉。

考茨基說“小生产力求生产资料的完全私有”，說立宪會議是能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权威”（这种論断在俄国只会令人捧腹大笑，因为大家知道，工农认为有权威的只是苏維埃，立宪會議已經成了捷克斯洛伐克軍团和地主的口号）。他接着說：

“在苏維埃政府頒布的第一批法令中，有一道法令規定：1. 立刻不付任何赎金地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2. 地主的田庄以及一切皇族、寺院和教堂的上地，連同耕畜、农具、庄园建筑和一切附屬物，一律交給乡土地委员会和县农民代表苏維埃支配，直到立宪會議解决了土地問題时为止。”

考茨基仅仅引了这两条之后就作出結論說，

“把立宪會議提出來，始終不过是紙上空文。实际上各乡农民可以任意处理土地。”（第 47 頁）

請看，这就是考茨基的“批評”的标本！这就是十分近乎伪造的“科学”作品。他向德国讀者暗示：布尔什維克在土地私有制問題上向农民投降了！布尔什維克让农民各自（“各乡”）任意处理土地了！

其实，考茨基引用的 1917 年 10 月 26 日（旧历）頒布的第一道法令，不是两条，而是五条，再加上“委托书”八条，同时还指出这个委托书“應該作为指南”。

法令第三條說，农場轉“归人民”，必須編造“全部沒收财产清册”，并“用革命手段严加保护”。委托书中說，“土地私有制永远废除”，“具有高度农业文化的农場所占的上地”“不得分割”，“被沒收的土地上的耕畜和农具，視其大小和用途，不付贖金地交給国家或村社专用”，“一切土地都是全民的土地”。

其次，在解散立宪會議（1918 年 1 月 5 日）的同时，苏維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現在已納入苏維埃共和国根本法的“被剝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宣言第二条第一項說，“廢除土地私有制”，“模范田庄和模范农业企业属于国家財产”。

可見，把立宪會議提出来，并沒有成为紙上空文，因为另一个在农民看来有无比巨大权威的全民代議机构負起了解决上地問題的責任。

其次，1918 年 2 月 6 日（新历 19 日）公布了土地社会化法令。这个法令重申废除一切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全部私有农具和耕畜交給苏維埃政权处理，由联邦苏維埃政权进行监督。法令对处理土地的任务作了如下規定：

“減少个体經濟，发展就节省劳动和产品來說更为有利的农业集体經濟，以便向社会主义經濟过渡。”（第十一条第五項）

这个法令規定平均使用土地，同时对“誰有权使用土地”这一基本問題作了下列回答：

(第二〇条)“为了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可以使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境内的地面向：(甲)用于文化教育方面；(1)国家即苏维埃政权(联邦、区域、省、县、乡、村的)机关。(2)社会团体(应受地方苏维埃政权监督并经其允许)。(乙)用于经营农业方面：(3)农业公社。(4)农业合作社。(5)农村团体。(6)单个家庭和个人”……

读者可以看出，考茨基完全歪曲了事实，他以完全虚假的形式向德国读者介绍了俄国无产阶级国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法令。

考茨基甚至未能提出理论上重要的基本问题！

这些问题就是：

(1)平均使用土地以及

(2)土地国有化。这两种办法同社会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同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系。

(3)公共耕种制是从分散的小农业到公共的大农业的过渡；苏维埃法令对这个问题的提法能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的要求？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下列两个基本事实：(甲)布尔什维克在估计1905年的经验时(例如见我论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土地问题的著作)就曾指出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具有民主进步、民主革命的意义，在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又十分确定地说过这一点。(乙)布尔什维克在实行土地社会化法令(平均使用土地的口号是这个法令的“灵魂”)时十分明确肯定地说：这不是我们的主张，我们不同意这个口号，但我们认为有责任实行这个口号，因为这是绝大多数农民的要求。而大多数劳动者的主张和要求应该由他们自己抛弃，因为这种要求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跳过”。我们布尔什维克要帮助农民抛弃小资产阶级口号，使他们能尽量迅速、尽量容易地从这种口号过渡到社会主义口号。

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想用自己的科学分析帮助工人革

命，就必须回答下列問題：第一、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具有民主革命的意义，具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意义，这种說法是否正确？第二、布尔什維克投票通过（并十分忠实地遵守）平均使用土地的小资产阶级法令，这种做法是否正确？

考茨基甚至未能看出，从理論上看，問題的关键在哪里！

考茨基永远也无法否认平均使用土地的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进步意义和革命意义。这个革命不能超过这一点。当这个革命进行到底的时候，它就更加明显、更加迅速、更加容易地向群众暴露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解决办法是不够的，必须超出这个范围，过渡到社会主义。

打倒了沙皇制度和地主的农民渴望平均使用土地，任何一种力量也不能阻止摆脱了地主、摆脱了资产阶级議会制共和国的农民去实现这种理想。无产者对农民說：我們要帮助你們达到“理想的”资本主义，因为平均使用土地在小生产者看来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想化。同时我們要向你們指出，这种办法是不够的，必须过渡到公共耕种制。

要是看看考茨基怎样试图否认无产阶级对农民斗争的这种领导的正确性，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考茨基宁願迴避問題……

其次，考茨基公开欺骗德国讀者，对他们隐瞒了这个事实：苏维埃政权在土地法中把公社和合作社放在第一位，给了它们直接的优先权。

同农民一起，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同贫苦农民即同农民中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起，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这就是布尔什維克的政策，这就是唯一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可是考茨基糊塗了，连一个問題也不能提出！一方面，他不敢

說无产阶级在平均使用土地問題上應該同农民分离，因为他觉得这种分离是荒謬的（而且考茨基在1905年还没有成为叛徒的时候，曾明确而直接地坚持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他又深表同情地引用孟什維克馬斯洛夫的自由主义庸俗言論；这位馬斯洛夫“证明”小资产阶级的平等从社会主义观点看来是空想的和反动的，却不說小资产阶级爭取平等、爭取平均使用土地的斗争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点看来是进步的和革命的。

考茨基真是混乱到极点了。請看，他（1918年）坚持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他（1918年）要求不要超出这个范围！同一位考茨基又认为把小块土地租給貧苦农民（即近乎平均使用土地）这种小资产阶级改革含有“某些社会主义成分”（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來說）！！

真是莫名其妙！

此外，考茨基还暴露出他像庸人那样不善于考慮一定政党的实际政策。他摘引孟什維克馬斯洛夫的言論，却不願意看到孟什維克党1917年的实际政策；当时孟什維克党同地主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实际上坚持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主张同地主妥协（证据就是土地委员会委员的被捕和謝·馬斯洛夫的法令草案）。

考茨基沒有看見，彼·馬斯洛夫关于小资产阶级平等的反动性和空想性的言論，实际上是掩盖孟什維克主张农民同地主妥协（即让地主欺骗农民）而不許农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地主的政策。

好一个“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

正是布尔什维克严格估計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把前者进行到底，就为过渡到后者打开了門戶。这是唯一革命的和唯一马克思主义的政策。

考茨基枉費心机地重复着自由派的蹩脚的譏諷：“无论何时何

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論說服的影响下过渡到集体生产。”（第50頁）

多么机智呵！

无论何时何地，一个大国的小农都沒有受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影响。

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沒有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用宣传、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贫苦农民的条件下，碰到过贫苦农民同富有农民公开的阶级斗争以至内战。

无论何时何地，投机者和有钱人都沒有在农民群众这样破产的情况下这样大发战争财。

考茨基重弹老调，咀嚼陈旧的东西，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任务连想也不敢想。

請問可爱的考茨基，如果农民缺乏經營小生产的工具，而无产阶级国家帮助他們取得集体耕种土地的机器，这难道是“理論說服”嗎？—— ———

现在来讲土地国有化問題。我国的民粹派分子，包括一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內，都否认我們实行的办法是土地国有化。他們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既然我們还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土地私有制的廢除就是土地国有化。“社会化”一詞不过是表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願望和准备而已。

馬克思主义者对土地国有化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考茨基在这里也是甚至不能提出理論問題，更糟的是他故意迴避这个问题，虽然从俄国文献中可以看出，考茨基知道俄国馬克思主义者中間早就有过关于土地国有、土地地方公有（将大田庄交给地方自治机关）和土地分配的爭論。

考茨基硬說，将大田庄交给国家，然后分成小块租給少地的农

民，这样就会实现“一些社会主义成分”。这简直是嘲笑马克思主义。我们已经指出，这里没有丝毫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这里也没有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考茨基的最大不幸是他听信了孟什维克的话。于是闹出了这样的笑话：考茨基为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辩护，责备布尔什维克不该妄想走向社会主义，同时自己又拿自由主义的改革冒充社会主义，而且不把这种改革进行到完全肃清土地占有制方面的中世纪制度！结果，考茨基也同他的孟什维克顾问一样，不是维护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维护害怕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

实际上为什么只把大地产收归国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呢？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用这种方法可以保持最多的旧东西（就是使革命最不彻底），最容易恢复旧东西。激进资产阶级，即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所提出的，就是土地国有的口号。

考茨基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差不多在二十年前，曾写过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杰作，他不会不知道马克思说过的话：土地国有正是彻底的资产阶级口号<sup>38</sup>。考茨基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同洛贝尔图斯的论战以及他的精彩说明，在这本书内，马克思特别清楚地指出了土地国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上的革命的意义。

被考茨基不恰当地选为自己的顾问的孟什维克彼·马斯洛夫，曾认为俄国农民不会赞成全部土地（包括农民土地在内）的国有化。马斯洛夫的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同他的“新奇”理论（这个理论重复着批评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批评家的意见），即否认绝对地租、承认“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或如马斯洛夫所说的“土地肥力递减事实”）的观点有联系的。

其实，早在1905年革命中就已经表露出，俄国的绝大多数农

民，无论村社社员或单独农户，都赞成全部土地国有化。1917年革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里之后，就实现了这一点。布尔什维克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没有企图（正同考茨基凭空责备我们的相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布尔什维克首先帮助农民中最激进、最革命、最接近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实现了实际上是土地国有的办法。从1917年10月26日起，即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天起，俄国土地私有制就被废除了。

这就造成了从发展资本主义来看是最好的基础（如果考茨基不背弃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否认这一点），同时也建立了对过渡到社会主义来说是最灵活的土地制度。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俄国的革命农民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从这种观点看来，比土地国有、比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进”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只有布尔什维克，依靠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帮助农民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了。只是这样，布尔什维克才为促进和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做了最大限度的努力。

由此可见，考茨基献给读者的是多么不可思議的混乱思想，他责备布尔什维克不了解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自己却暴露出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他闭口不谈土地国有化，同时把最不革命的（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的土地改革当做“一些社会主义成分”！——

现在我们来谈上面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即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对过渡到公共耕种制的必要性估计得怎样。考茨基在这里又玩弄了一套近乎伪造的手法：他只是引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关于向集体耕种制过渡的任务的“提纲”！我们这位“理论家”引了其中一

条之后，就洋洋得意地嚷道：

“可惜得很，把某件事情宣布为任务，并不能使任务得到解决。在俄国，集体农业现在还只能是一纸空文。无论何时何地，小农都还没有在理论说服的基础上过渡到集体生产。”（第 50 页）

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堕落到像考茨基那样在写作方面招摇撞骗。他摘引“提纲”，而不提苏维埃政权的法令。他谈论“理论说服”，而不提既掌握工厂、又掌握商品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1899 年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谈到无产阶级国家拥有把小农逐步转到社会主义的手段时所写的一切，被 1918 年的叛徒考茨基忘得干干净净。

当然，几百个由国家维持的农业公社和国营农场（即由国家出资、由工人合作社耕作的大农场）是很少的。可是考茨基回避了这个事实，这难道能够叫做“批评”吗？

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实行的土地国有化，最充分地保证了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即便反革命的胜利会使土地国有化退到土地分配（关于这一点，我在论马克思主义者在 1905 年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内作了专门的分析）。此外，土地国有化使无产阶级国家有最大可能在农业中过渡到社会主义。

总之，考茨基在理论上真是一塌糊涂，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则是向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卑躬屈膝。他的批评真是漂亮极了！

\* \* \*

考茨基对工业所作的“经济分析”是用下面这段妙论开场的：

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呢？“如果社会主义就是各个厂矿的工人把厂矿拿来当作自己的财产（直译就是把厂矿据为已有），就是在每个工厂里独

自經營，那是可以這樣設想的。”（第 52 頁）考茨基又補充說：“正是今天，8 月 5 日，當我寫這些話時，莫斯科報道了列寧 8 月 2 日的一篇演說，據報道，列寧在演說中提到：‘工人會牢牢地掌握着工廠，農民決不會把土地交給地主。’‘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這個口號，從來不是社會民主黨人的口號，而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口號。”（第 52—53 頁）

我們把這段談論全部抄下來，好讓從前尊敬過考茨基的（而且尊敬得有道理的）俄國工人親自看看投降資產階級的叛徒所使用的手法。

只要想想，8 月 5 日俄國已經頒布了許多關於工廠國有的法令，沒有一個工廠被工人“據為己有”，所有工廠都轉歸共和國所有，可是在這個 8 月 5 日，考茨基竟用明顯的欺騙手法解釋了我的演說中的一句話，想使德國讀者相信俄國把工廠交給了各个工人！接着考茨基在好幾十行里反復叫囂，說不能把工廠交給單個工人！

這不是批評，而是資本家雇來誣蔑工人革命的資產階級奴僕所使用的手法。

工廠應該交給國家，或者交給公社，或者交給消費合作社，——考茨基再三地這樣說，最後他補充道：

“在俄國，人們現在也企圖走這條道路”…… 現在！！這話究竟什麼意思呢？是指 8 月嗎？難道考茨基不能請他的史騰、阿克雪里羅得或其他俄國資產階級朋友們至少譯出一個工廠法嗎？

……“在這方面走得遠，現在還看不出來。無論如何，蘇維埃共和國的這一方面，是我們最感興趣的，但是這一方面現在還完全處於蒙昧狀態。法令是多樣了”……（因此考茨基忽視了或對讀者隱瞞了法令的內容；）“可是關於這些法令的效力，却缺乏可靠的資訊。沒有全面的、詳盡的、可靠的、報道迅速的統計，社會主義生產是不可能的。蘇維埃共和國至今還不能建立這樣

的統計。我們所知道的有关它的經濟活動的消息极为矛盾，根本无从核对。这也是专政和压制民主的結果之一。沒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第 53 頁）

看，就是这样写历史的！考茨基从資本家和都托夫分子的“自由”报刊上会得到关于工厂交给工人的消息……这个超阶级的“严肃的学者”真是妙不可言！无数的事实证明工厂只是交给共和国，管理工厂的是苏维埃政权設立的、主要由工会选出的工人参加的机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可是考茨基对这些事实一个也不願意提起。他以套中人的頑固态度，口口声声說：給我和平的民主，沒有內戰、沒有专政而有很好的統計（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了統計机关，吸收了俄国所有的优秀的統计人材，当然，要很快得到理想的統計，还是不可能的）的民主。总之，考茨基要求的是沒有革命、沒有激烈斗争、沒有暴力的革命。这同要求在罢工时工人与雇主双方都不要有狂热的冲动一样。請把这种“社会主义者”同庸俗的自由主义官僚区分区分看！

考茨基根据这种“实际材料”，也就是以极端蔑視的态度故意避开无数事实，得出“結論”說：

“俄国无产阶级在苏维埃共和国得到的真正实际果实（不是法令），是不是会比它从立宪會議——也同苏维埃一样，其中大多数代表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得到的多些，这是很值得怀疑的。”（第 58 頁）

这岂不是妙論嗎？我們奉劝考茨基的信徒們把这段名言拿到俄国工人中间更广泛地加以传播，因为考茨基提供不出更好的材料來說明他在政治上的墮落了。工人同志們，克伦斯基也曾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色彩不同”罢了！历史学家考茨基滿足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据为已有”的称号。至于证明孟什維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克伦斯基时期支持过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和搶劫行为的事实，历史学家考茨基是連听也不願意听的；至于

正是这些帝国主义战争和资产阶级专政的英雄们在立宪会议中占了多数的事实，考茨基则很客气地隐晦不谈了。这还叫做“经济分析”呢！

最后还要举一个“经济分析”的范例：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九个月，不仅没有推广普遍福利，反而不得不说明发生普遍贫困的原因。”（第 41 页）

立宪民主党人已经使我们听惯了这种议论。俄国资产阶级的走狗都說：九个月过去了，你们拿出普遍福利来吧，就是說要在四年破坏性战争之后，在外国资本从各方面支持俄国资产阶级怠工和暴动的时候拿出普遍福利来。考茨基和反革命资产者实际上沒有絲毫差別，連一点差别的影子也沒有。用“社会主义”做招牌的甜言蜜語，不过是重复俄国科尔尼洛夫分子、都托夫分子和克拉斯諾夫分子露骨地、直截了当地、毫不掩饰地说出来的話罢了。

\* \* \*

上面这些，是我在 1918 年 11 月 9 日写的。当天夜里收到了从德国来的消息，說已經开始的革命首先在基尔和北方沿海一带的其他城市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已轉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随后在柏林取得胜利，那里的政权也轉到苏维埃手中了。

因此，給这本論考茨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小册子写个结束语，就成为多余的了。

1918 年 11 月 10 日

写于 1918 年 10—11 月

載于 1918 年“共产党人”出版社  
莫斯科版的单行本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手稿  
做过校订

## 附录一

### 关于立宪會議的提綱

1. 把召集立宪會議的要求列入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綱領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立宪會議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因为以克伦斯基为首的帝国主义共和国在建立議会时，是用許多违反民主制的办法准备假选举的。
2. 革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召集立宪會議的要求，从 1917 年革命一开始，就多次着重指出，苏维埃共和国是比有立宪會議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更高的民主制形式。
3. 对于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无产阶级专政，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类型的民主机构的形式（与有立宪會議这一花冠的普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相比），而且是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唯一形式。
4. 在我国革命中，按照 1917 年 10 月中旬提出的名单召集立宪會議，是在无法通过这个立宪會議的选举正确表达一般人民的意志，特别是劳动群众的意志的情况下进行的。
5. 第一、只有当各党派候选人名单符合人民分成这个名单所反映的党派的实际情况时，比例选举制才能真正表达人民的意志。在我国，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从 5 月到 10 月在人民中特别是在农民中受到最多人拥护的党，社会革命党，在 1917 年 10 月中旬提出了统一的立宪會議代表候选人名单，但是在立宪會議选举以后，會議召开之前，发生了分裂。

因此，立宪會議的当选代表的比例，即使在形式上也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符合大多数选民的意志。

6. 第二、立宪會議当选代表的比例所以不符合人民意志，特別是不符合劳动阶级的意志，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根源，不是形式上、法律上的根源，而是社会經濟的根源，即阶级的根源，这就是在进行立宪會議选举时，绝大多数人民还不可能知道在 1917 年 10 月 25 日，即在立宪會議代表候选人名单提出以后开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十月苏維埃革命的全部規模和意义。

7. 十月革命为苏維埃夺取了政权，把政治統治权从資产阶级手里夺取了过来，并把它交给了无产阶级和貧苦农民，我們看到这次革命正经历着循序发展的阶段。

8. 革命从 10 月 24—25 日在首都取得胜利开始，当时工兵代表苏維埃——无产者和政治上最积极的那部分农民的先锋队——的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使布尔什維克党获得了优势，掌握了政权。

9. 然后，在 11 月和 12 月間，革命席卷了军队和农民的全部群众，这首先表现为撤销和改造旧的上层組織（军队委员会、省农民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等），这些組織所代表的是革命已經經過的、妥协的时期，是革命的資产阶级阶段，而不是无产阶级阶段，因此这些組織必然要在更深更广的人民群众的压力下退出舞台。

10. 直到現在，即 1917 年 12 月中旬，被剥削群众的这种改造自己組織的领导机关的强大运动还没有結束，而还没有閉幕的铁路員工代表大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阶段。

11. 因此，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俄国各个阶级力量的划分情况，在 1917 年 11 月和 12 月間，实际上根本不同于 1917 年 10 月

中旬各党派立宪會議代表候选人名单所反映的情况。

12. 最近乌克兰的事件同样也說明(芬兰、白俄罗斯和高加索的事件也部分地說明)，在乌克兰拉达、芬兰議會等等的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同各該民族共和国的苏維埃政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力量正在重新划分。

13. 最后，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对苏維埃政权、反对工农政府的反革命暴动所挑起的内战，使阶级斗争达到最尖锐的程度，使历史在俄国各族人民面前，首先是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面前提出的最尖锐的問題，完全沒有可能用形式上民主的方式来解决。

14. 只有工农完全战胜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暴动(其表现是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运动)，只有用武力无情地镇压这种奴隶主的暴动，才能真正保障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在革命中，事变的进程和阶级斗争的发展实际上已經使“全部政权归立宪會議”的口号成为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及其帮凶的口号。这个口号不考虑工农革命的成果，不考虑苏維埃政权，不考虑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代表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決議等。現在全体人民都明白了，这个口号实际上意味着为排除苏維埃政权而斗争，立宪會議如果同苏維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

15. 和平問題是人民生活中特別尖銳的問題之一。爭取和平的真正革命斗争在俄国只是在10月25日革命胜利以后才开始的，这个胜利产生的初步成果就是公布秘密條約，締結停战協議，开始就不割地不赔款的普遍和約进行公开談判。

广大人民群众直到現在才真正充分地、公开地有可能看到爭取和平的革命斗争的政策，并研究它的結果。

在选举立宪會議時，人民群众是没有这种可能的。

显然，从这一方面来看，立宪會議当选代表的比例不符合人民在結束战争这个問題上的真正意志也是必然的。

16. 上述所有情况造成了这样的結果：按照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以前、在资产阶级統治下存在的各党派所提的候选人名单召集的立宪會議，必然同 10 月 25 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资产阶级的被剥削劳动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相冲突。这个革命的利益自然高于立宪會議形式上的权利，何况这些形式上的权利还由于立宪會議法不承认人民有权随时改选自己的代表而遭到破坏。

17. 凡是直接或間接想从形式的法律的方面，想在通常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來考察立宪會議問題，而不估計到阶级斗争和內战，那都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轉到资产阶级的观点。布尔什維克党的少数领导人因为不善于评价十月起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犯了这种錯誤。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尽的責任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不要犯这种錯誤。

18. 由于立宪會議的选举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剥削劳动阶级的利益，因而产生了危机。唯一可能无痛苦地解决这一危机的办法是：让人民尽量广泛地、迅速地实现改造立宪會議代表的权利；立宪會議本身同意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造的法令；立宪會議无条件地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苏维埃革命以及它在和平問題、土地問題和工人監督問題上的政策；立宪會議坚决站到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反革命势力的阵营中来。

19. 如果沒有这些条件，由立宪會議引起的危机便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这就是說，苏维埃政权要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来反对立宪民主党人和卡列金分子的反革命勢力，而不管他們用什么口号和机构（即使是用立宪會議代表的資格）來

掩护。任何想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企图都是帮助反革命。

写于 1917 年 12 月 12 日(25 日)

载于 1917 年 12 月 26 日(13 日)“真理报”第 213 号

转载于 1918 年莫斯科“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宁(弗·乌里扬诺夫)“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

按该书原文刊印

---

## 附录二

### 王德威尔得論国家的新书

我讀了考茨基的这本书之后，才看到了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國家”一书（1918年巴黎版）。使人禁不住要把这两本书比較一下。考茨基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思想領袖；王德威尔得是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主席，是第二国际的正式代表人物。他們两人都反映了第二国际的完全破产，他們两人都以老练的記者的圓滑手腕，用馬克思主义的詞句“巧妙地”掩盖这种破产，掩盖自己破产和轉到资产阶级方面的事实。前者特別清楚地表明德国机会主义的典型特点，即粗笨，好发空論，笨拙地伪造馬克思主义，其方法是把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一概砍掉。后者是在罗曼語国家——在相当程度內可以說是在西歐一帶（就是說：德国以西一帶）——占統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典型人物，这种机会主义比較圓滑，不那样粗笨，伪造馬克思主义也伪造得更精巧，所用的基本手法則与前者相同。

他們两人都根本歪曲了馬克思的国家學說和无产阶级专政學說，只是王德威尔得对第一个問題談得多些，考茨基对第二个問題談得多些。他們两人都抹杀这两个問題极共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們两人口头上都是革命者和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都是叛徒，都是尽力迴避革命。他們两人絲毫沒有那种貫串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中的东西，沒有那种使真正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揶揄区别开的东西，就是說，他們絲毫沒有說明

革命的任务不同于改良的任务，革命的策略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策略，无产阶级在消灭雇佣奴隶体系或秩序、制度中所起的作用，不同于“大”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享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极小部分超额利润和额外赃物中所起的作用。

現在我們舉出王德威尔得几个最重要的論斷來证实这种估計。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引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論是非常积极的。他同考茨基一样，对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論，除了資产阶级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外，除了区别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的以外，什么都引用。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話，說过不知多少，因为他們的实践已經把这一点納入純粹議会斗争的范围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了巴黎公社的經驗之后，认为必須对部分陈旧了的“共产党宣言”加以补充，即說明这样一个真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而应当打碎这个机器。关于这一点，他却一字不提！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不約而同地恰恰閉口不談无产阶级革命經驗中最重要的东西，恰恰閉口不談使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资产阶级改良的东西。

王德威尔得同考茨基一样，談論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拒絕这个专政。考茨基用粗笨的伪造手段做到这一点。王德威尔得則用更巧妙的手段干着同样的勾当。他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章即第四章中，用“乙”节專門闡述了“无产阶级的集体专政”問題，“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我再說一遍：他恰恰是把最主要的地方，即关于打碎旧的資产阶级民主国家机器的地方丟掉了），并作出結論說：

……“社会主义者通常是这样想像社会革命的：建立新的巴黎公社，但这次将是获得胜利的公社，并且不是在一个地方胜利，而是在資本主义世界各

个主要中心里获得胜利。

这是一个假設；但这个假設現在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議之处，因为目前已經看得很明显，許多國家在战后时期必将发生空前的阶级对抗和社会动荡。

不过，如果說巴黎公社的失败——俄国革命的灾难更不用說了——真是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证明：在无产阶级沒有充分的准备来利用那由于情勢的发展而会落到自己手里的政权以前，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第73頁）

涉及問題实质的，不过如此而已！

这就是第二国际的领袖和代表人物！1912年，他們签署了巴塞尔宣言，在宣言中直接談到后来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直接以这种革命相威吓。但是，当战争已經发生、革命形势已經形成的时候，他們这些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却开始拒絕革命了。請看，巴黎公社类型的革命只是一种并非不可思議的假設！这同考茨基关于苏维埃在欧洲可能起的作用的議論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要知道，一切有学識的自由主义者都是这样議論的，他們現在一定会同意說：新的公社“并非不可思議”，苏维埃将起很大的作用等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作为一个理論家應該分析的正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新的国家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黎公社的經驗时，对这个问题作过詳細的說明，王德威尔得却把这一切完全抹杀了。

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实践家和政治家应当說明，現在只有社会主义叛徒才会拒絕下列任务：闡明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社类型的、苏维埃类型的或者第三种类型的革命）的必要性，說明准备这种革命的必要性，在群众中宣传革命，駁斥反对革命的市侩偏見等等。

无论考茨基或王德威尔得都根本不做这件事情，这正是因为他們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是希望在工人中间保持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声誉的叛徒。

从理論上来提出这个问题吧。

即使在民主共和国里，国家也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考茨基知道、承认并赞成这个真理——但是……但是他避开最根本的问题：当无产阶级取得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它究竟应当镇压哪个阶级，为什么要镇压这个阶级，并且采用什么手段去镇压。

王德威尔得知道、承认、赞成并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见他的书第72页），但是……他只字不提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一“不愉快的”（对资本家先生们）问题！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他們完全回避了这个“不愉快的”問題。他們的叛徒行徑也就在这里。

王德威尔得也同考茨基一样，是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的大师。一方面，不能不意識到，另一方面，應該承认。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总和”（见李特列編的詞典——不待說是渊博的著作！——参看王德威尔得的书第87页），另一方面，国家可以理解为“政府”（同上）。王德威尔得抄袭这个渊博的庸俗論調，称赞这种論調，把这种論調和马克思的言論列在一起。

王德威尔得說，“国家”一詞的馬克思主义的含义和通常的含义不同。因此可能产生“誤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国家，并不是广义的国家，不是作为管理机关、作为社会共同利益(*intérêts généraux de la société*)的代表的国家，而是作为国家政权的国家，是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是作为一个阶级統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王德威尔得的书第75—76页）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到消灭国家时，指的只是后一种含义的国家……“过于絕對的論斷，會冒不确切的危险。在以单独一个阶级的統治为基础的資本家国家和以消灭阶级为目的的无产阶级国家之間，有許多过渡阶段。”（第156頁）

請看，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手法”，它同考茨基的手法只是稍微有点不同，实质上则完全一样。辩证法在闡明历史上对立物的更迭和危机的意义时，否认絕對真理。折衷主义者不要“过于絕對的”論斷，为的是暗中貫彻市侩庸人的希望：用“过渡阶段”代替革命。

作为資本家阶级統治机关的国家和作为无产阶级統治机关的国家之間的过渡阶段，恰恰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革命，对于这一点，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都默不作声。

资产阶级专政由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来代替，革命的各个“过渡阶段”过去后，接着就是无产阶级国家逐渐消亡的各个“过渡阶段”，这一点，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都一笔勾銷了。

這也就是他們在政治上的叛徒行徑。

這也就是在理論上哲学上用折衷主义和詭辯术偷換辩证法。辩证法是具体的和革命的，它把一个阶级专政向另一个阶级专政的“过渡”，与无产阶级民主国家向非国家（“国家的消亡”）的“过渡”这两者区分开来。考茨基分子和王德威尔得分子的折衷主义和詭辯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抹杀了阶级斗争中一切具体的和确切的东西，提出了“过渡”这个一般概念来掩盖（现代十分之九的官方社会民主党人都借此掩盖）背弃革命的行为！

王德威尔得作为一个折衷主义者和詭辯家，比考茨基巧妙些，

精細些，因为用“从狭义国家向广义国家的过渡”一語，可以避开任何革命問題，可以避开革命和改良的一切区别，甚至可以避开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区别。因为，有哪—个受过歐式教育的资产者想“一般”否认这种“一般”意义的“过渡阶段”呢？

王德威尔得写道：“我同意蓋得的意見，如果不預先实现下列两个条件，生产資料和交換資料的社会化是不可能的，

1. 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办法，把现在的国家即一个阶级統治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变成門格爾所說的劳动的人民国家。

2. 把作为权威机关的国家和作为管理机关的国家分开，或者像圣西門所說的，把对人的管理和对物的管理分开。”（第 89 頁）

王德威尔得把这段話加上了着重号，来特別強調这些論点的意义。其实这是最純粹的折衷主义的糊塗观念，是同馬克思主义的完全決裂！要知道，“劳动的人民国家”一語，不过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所标榜的、而被恩格斯責斥为尤稽之談的“自由的人民国家”的旧調重彈<sup>39</sup>。“劳动的人民国家”的說法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詞句，是以非阶级概念代替阶级概念。王德威尔得把无产阶级（一个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同“人民”国家相提并論，而沒有觉察到从这里只能得出一堆糊塗观念。从考茨基的“純粹民主”得出的同样是糊塗观念，同样是站在市侩的反革命的立場上，忽視阶级革命的任务，忽視无产阶级阶级专政的任务，忽視阶级国家（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

其次，只有在任何国家都消亡了的时候，对人的管理才会消失而让位給对物的管理。王德威尔得用这种比較遙远的未来，去遮盖和模糊明天的任务——推翻资产阶级。

这种伎俩还是等于替自由资产阶级效劳。自由主义者同意談談在对人用不着管理的时候将会是怎样的。为什么不能談談这种

无害的空想呢？至于无产阶级镇压抗拒剥夺的资产阶级的反抗，那就闭口不谈了。这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所要求的。

“社会主义反对国家”。这是王德威尔得恭维无产阶级。恭维是不难的，任何一个“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善于恭维自己的选民。但掩藏在“恭维”下面的是反革命的反无产阶级的内容。

王德威尔得详细地转述了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言论<sup>40</sup>，说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文明的、冠冕堂皇的外表掩藏着多少欺骗、暴力、收买、谎言、伪善以及对贫民的压制。但是，王德威尔得并没有从这里得出结论。他看不出，资产阶级民主镇压被剥削劳动群众，而无产阶级民主则要镇压资产阶级。在这一点上，考茨基和王德威尔得都是骗子。这些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叛徒是跟着资产阶级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要求他们避开这个问题，隐瞒这个问题，或者直接否认这种镇压的必要性。

市侩折衷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诡辩术反对辩证法，庸俗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王德威尔得的书应该用的标题。

写于 1918 年 10—11 月

载于 1918 年“共产党人”出版社  
莫斯科版的单行本

该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手稿  
做过校订

## 注 释

- 1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创刊，1917年1月停刊，共出58号。创刊号在俄国出版，后来移至国外，先在巴黎，后在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报”刊载过八十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自1911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刊载了斯大林的许多文章。——第1页。
- 2 “共产党人”是列宁组织的一个杂志，1915年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日本内瓦出版。只出了一期（合刊），其中刊载了列宁的三篇文章：“第二国际的破产”、“法西社会党人的正直呼声”、“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1卷第183—236、327—335、336—345页）。
- 列宁在杂志编辑部内进行了反对布哈林—皮达可夫反党集团的斗争，揭穿了该集团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和利用杂志来达到派别目的企图。由于该集团的反党立场，列宁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同它断绝关系并停止共同出版杂志。从1916年10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开始出版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1页。
- 3 指小册子“社会主义和战争”，这本小册子于1915年9月用德文出版，曾分发给齐美尔瓦尔得社会党人代表会议的代表。这本小册子的法文本出版于1916年。——第1页。
- 4 见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31页）。——第5页。
- 5 见弗·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7页）。
- 本书第15页和第37页上，列宁引用的也是弗·恩格斯的这封信（同上）。——第9页。
- 6 这是弗·恩格斯在给卡·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发表的

思想(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60頁)。——第11頁。

7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14頁。——第12頁。

8 見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2頁)。——第12頁。

9 見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18頁)[列寧引的恩格斯這句話的全文是：“比如，古代的國家，首先就是奴隸所有者用以鎮壓奴隸的國家，封建的國家是貴族用以鎮壓農奴的機關，而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則是資本剝削壓抑勞動的工具”。——譯者注]。——第15頁。

10 見卡·馬克思“法蘭西內戰”(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63—464頁)。——第15頁。

11 見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20頁)。——第15頁。

12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7卷第358、360頁。——第15頁。

13 指英國資產階級血腥鎮壓1916年愛爾蘭反對英國奴役的起義的參加者。列寧在1916年寫道：“在歐洲……愛爾蘭舉行了起義，被‘愛好自由的’英吉利人用死刑平定下去了。”

烏爾斯脫是愛爾蘭的東北部分，居民以英吉利人為主；烏爾斯脫的軍隊曾和英國軍隊一起鎮壓愛爾蘭人民的起義。——第17頁。

14 夏洛克是威·莎士比亞的喜劇“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角色。——第20頁。

1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8卷第297頁。——第22頁。

16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14頁。——第23頁。

17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7頁。——第23頁。

18 見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89页)。——第31页。

- 19 列宁指的是弗·恩格斯给卡·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苏卷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63页)。——第31页。
- 20 弗·伊·列宁的小册子“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用英文发表于1918年1月15日的《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纽约晚报报”)上，并在纽约印成单行本。——第36页。
- 21 《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纽约晚报报”)是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创办于1801年。多年来一直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后来该报被约·皮尔朋特·摩尔根公司收买，成了美国最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机关报。现在叫做《The New York Post》(“纽约邮报”)。——第36页。
- 22 李伯尔唐恩是送给布什维克的首領——李伯尔、唐恩及其拥护者的諷刺性的綽号，自从1917年8月25日(9月7日)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41号发表了杰·別德内依的小品文“李伯尔唐恩”之后，这个綽号就叫开了。——第47页。
- 23 列宁指的是1891年10月19日奥·倍倍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的演說。——第48页。
- 24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报纸，自1856年至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48页。
- 25 《Vorwärts》(“前进报”) (日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自1876年起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弗·恩格斯曾在该报上对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从90年代后五年起，即在弗·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经常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内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进报”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上。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前进报”成了反苏宣传中心之一。该报在柏林出版到1933年。
- 从1946年4月起，“前进报”又在柏林复刊，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组织出版。——第48页。
- 26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是列宁于1915年9月初(新历)在齐美尔瓦尔得

(瑞士)召开的国际主义者第一次代表会议组成。列宁称这次代表会议为国际反战运动发展中的“第一步”。在齐美尔瓦尔得左派中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采取了唯一正确的彻底的反战立场。在这个左派中也有不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弗·伊·列宁的文章“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关于自决问题的争端总结”(《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卷第298—313、314—354页)，以及约·维·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一信(《斯大林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76—91页)，批判了他们的错误。——第53页。

- 27 论述战争的巴塞尔宣言是1912年在巴塞尔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这个宣言，见“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1卷第184—193、286—287页。)——第53页。
- 28 列宁引的是弗·恩格斯给卡·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54页)。——第54页。
- 29 见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7卷第358页)。——第54页。
- 30 “斯巴达克”联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6年1月1日成立的。战争开始后，德国左派社民民主党人组成了由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领导的“国际”派。这一派又叫做“斯巴达克”联盟。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叛卖行为。但是斯巴达克派即德国左派，在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未能摆脱半孟什维主义的错误。弗·伊·列宁的“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卷第298—313页)，“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18—72页)等等，以及约·维·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一信(见“斯大林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卷第76—91页)，批判了德国左派的错误。1917年4月，斯巴达克派加入了德国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但在

党内保持了自己组织上的独立性。德国 1918 年——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和“独立党人”断绝了关系，并于同年 12 月建立了德国共产党。  
——第 61 页。

- 3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1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6 卷第 126—127 页。——第 65 页。
- 32 从“左派”社会革命党分裂出两个新党——“民粹主义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是 1918 年 7 月 6—7 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挑衅地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并举行叛乱之后发生的事情。“民粹主义共产党”谴责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对苏维埃的活动，并在 1918 年 9 月的代表会会议上成立了自己的党。1918 年 11 月“民粹主义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宣布解散“民粹主义共产党”并和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合并。

“革命共产党”是一个成员不多的政党，存在到 1920 年。1920 年 10 月，俄共（布）中央准许各党组织吸收前“革命共产党”的党员加入俄共（布）。——第 65 页。

- 33 海因里希·维贝尔耶奥托·鲍威尔。——第 68 页。
- 3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1962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87 页。——第 69 页。
- 35 列宁指的是 1918 年 7 月发生的几次富农反革命暴动，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白卫分子用英法帝国主义者的金钱、按英法帝国主义者的指示组织的（见“列宁全集”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8 卷第 126 页）。——第 72 页。
- 36 布朗基主义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1805—1881）为首的一个流派。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家认为布朗基是一个卓越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同时也批判了他的宗派主义和阴谋活动方式。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认为把人类从雇佣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不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靠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活动。——第 73 页。
- 37 列宁指的是社会革命党人拟定的“关于调整土地关系”和“关于出租的土地”等问题的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一部分已于 1917 年 10 月在社会革

命党人的报刊上发表。列宁写道：“謝·列·馬斯洛夫的草案是为了和地主妥协，为了挽救地主而写的‘地主的’草案。”（见弗·伊·列宁“社会革命党对农民的新騙术”。“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卷第208—213頁）

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临时政府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和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行为，逮捕了土地委员会委员。——第74頁。

- 38 参看卡·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說史”1957年三联书店版第2卷第199頁。——第81頁。
- 39 参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7頁。——第97頁。
- 40 指莫·奧斯特罗果尔斯基的《*La Démocratie et les Partis Politiques*》（“民主和政党”）一书，初版出版于1903年，訂正的第2版出版于1912年。——第98頁。

统一书号：1001·60  
定 价： 0.30 元